



#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 师范教育系

(教案)

课 程 名 称：                     论语选讲                    

任 课 老 师：                     谢若秋

# 《论语选读》教案

## 背景知识

### 第一讲 孔子和《论语》

#### 【授课年级】

小学语文教育 2023 级。

####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春秋时期的一些历史文化知识和孔子的生平，作为本课程学习的背景知识。

#### 【教学方法】

讲读法。

#### 【教学内容】

本节作为这门课的第一部分，将其作为解读《论语》的背景知识，让学生在研读《论语》时能借助这些相关的知识更好地理解《论语》中各章句的内容，因为《论语》一书是缺乏语境的，对春秋时期的历史社会特点和孔子生平作必要的介绍，将能更好地帮助学生解读《论语》。

### 第一节 孔子

凡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孔子。孔子是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生活于“礼乐崩坏”的春秋中后期，以恢复古代文化传统为己任，收徒讲学，奔走于列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整整的奋斗了一辈子。他在世时许多人对他很不理解，有人甚至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但他的弟子却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个德行高尚的人，孔子擅长言语的学生子贡曾对人说，他的老师是诋毁不了的，如果其他贤者是丘陵，还能逾越的话，他的老师则是日月，是不可逾越的。他还说，“夫子的不可企及，犹如登天不能沿着台阶爬上去一样”。例如下列三章：

19—23：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宫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张》）

19—24：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可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自量也。”（《子张》）

19—25：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

如果说，“仲尼不可毁”出自子贡之口还带有感情因素的话，那么，对于两千五百多年后的我们来说，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列子·力命》说：“仲尼之望，不出诸侯之下。”孔子之所以“不可毁”，并非指他的学说毫无缺点，而是说像这样一位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地加以否定的。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有位名叫迈克尔·H·哈特的学者对人类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一百位名人排列名次，孔子位居

第五。他说：“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孔子为什么对中国有着巨大的魔力。第一，人们都毋庸置疑地认为他为人真诚，个性完美。第二，他不偏不倚，讲求实际，他不要人们去做力所不及的事，而要求他们诚实，从不苛求他们白璧无瑕。从这些方面来看，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人讲求实际的气质，也许这就是他的思想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孔子不要求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基本信念，而是用清晰生动的语言一再重申他们的传统理想。也许没有那一种哲学能像孔子的那样与基国民的基本观点相连得这样密切了。……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用当今西方标准来衡量这似乎未免有点迂腐和乏味。然而作为政治哲学，实践证明它的成就是显著的……”

## 一、孔子生平简介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曲阜人（今山东曲阜市）。生于公元前 551 年，卒于前 479 年，享年 73 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

### （一）家庭身世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公族（宋国为周武王分封的侯国，其国君为商王族之后），远祖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后为避难流亡至鲁国，从此入籍为鲁国人。孔子的父亲孔纥（以祖名“孔”字为氏，其后裔从此以“孔”为姓），因有战功被封为陬邑（在曲阜境内）大夫。孔纥晚年（已近古稀之年）与少女颜徵在结婚（因孔子的父母在年龄上相差约 40 岁，悬殊较大，且未经媒妁而自由结合，这种结合不符合礼制，故史有“野合”之说），于鲁襄公 22 年，即公元前 551 年生孔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祷于尼丘而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孔子有九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及一位兄长。其兄名字为孟皮，孔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孔子出生的第三年，其父孔纥去世，母亲颜氏遂将其从陬邑带回到曲阜。颜氏对他教育很严，孔子自幼养成好礼的习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稍长，即知“发愤为学”（《论语·为政》-24：“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同时由于家贫，养成了许多独立生活的本领。鲁昭公七年，即公元前 535 年，16 岁的孔子前往参加鲁国执政之卿季武子举办的招待士的宴会，但其家臣阳虎拒之门外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19 岁结婚，娶宋国丌官氏女子为妻。为家室之累，曾做过鲁国当权大夫季氏的几种小吏，如“委吏”、“乘田”等。这些劳务实践增长了他的生产知识，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所以，孔子曾自许地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子罕》9—6）

但孔子着力学习的不是维持生活的生产管理技能（“鄙事”）。他是陬邑大夫孔纥的后裔，属于贵族中的“士”阶层，他学习的是作为一个士族成员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是当时学校教育的六种必修课。春秋以前官吏文武不分，每个爱教育者既要学文，也要学武。各诸侯国的执政之卿既是最高军事统帅，又是最重要的宰辅之臣。他们往往“出将入相”，即战时率军出征，平时处理政务。一般的中下层官吏平时主要从事文职工作，战时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所以当时的官府之学一方面要教授各种文化知识，同时对射、御等军事体育科目也很重视。在学习方面，他自称“士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信而好古”（《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学而不厌”（《子罕》）等。强调为学要“谋道不谋食”（《卫灵公》-32）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愿望，广泛地涉猎《诗》、《书》、《易》和其他各种历史文化典籍，还经常到各地去访问考察，虚心向他人请教学习。他要求学生要通过学习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雍也》-13）。学习上自己坚持“吾道一以贯之”（《里仁》-15）最后形成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

孔子 20 岁时生了儿子，鲁国国君得知这一消息，就给他送去一只大鲤鱼，于是孔子为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可以估计这时的青年的孔子已是鲁国有名的学者了。

## （二） 从事教育

商周时代，学在官府，教育被奴隶主贵族垄断，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接受教育，平民和奴隶的子弟则没有这个权利。春秋时期，社会发生了大变动，开始出现封建生产方式，这种学在官府的古典学制开始遭到冲击，从而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即过去被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文化知识，逐渐向新兴的工商地主阶级和平民阶层推广普及。孔子适应了这一历史趋势，办起了私人教育事业，即“私学”。

1、孔子吸收学生的方针是“有教无类”（《卫灵公》），即招收的学生不分族类、阶层、贫富和年龄等。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也。”（《述而》）即只要能交纳一定的学费，都可接收作其学生，接受教育。这是对“有教无类”的最好注解。因此史有“孔门多杂”之说。《荀子·法行》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注：指矫正竹木的工具。）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十七始收弟子，《史记索引》则载孔子收徒时三十五岁，这较可信。

（杏坛：传说孔子聚徒讲学的地方。《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缙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庄子》中多用寓言，本非实指。后来人们逐据此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为之筑坛，建亭，书碑，植杏。后名此坛为“杏坛”。杏坛逐渐成为授徒讲学之地，现代用以比喻教育事业。

“杏林”则指医学界，相传三国时吴人董奉在今江西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但使病重愈者植杏五株，轻者一株，积年而杏树无数，遂蔚然成林。）

## 2、孔子教育的内容

（1）传统课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2）各种为人处事的原则，

（3）重视“诗教”：“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 17——9），并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16——13）。“用诗”为春秋战国之时尚。

## （三） 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和学习过程的特点。一部《论语》“学”字出现了 65 次，对于人的学习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反复讨论。在封建社会官方加给他的众多“桂冠”中，最恰当的应是清朝康熙皇帝题写孔庙大成殿匾额的“万世师表”四字。

1、注意“因材施教”。学生发问，能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给予回答。孔子在教学实践中做到了“因材施教”，却未将其抽象为理论。“因材施教”是北宋程颐第一个讲的。原话是“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二程集》第一册第 252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南宋朱熹《四书集注》进一步阐发孔子因材施教的意义。经常谈到“启发式”教学（述而 7——8）。《论语》中提到孔子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有“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先进 11——13）朱熹注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孟子·尽心上》载：“有成德者，有达财才者。”朱熹注说：“财与材同。此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

2、经常谈到“启发式”教学（述而 7——8）。

《论语·述而》说：“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这段话提示了启发式教学的原理。郑玄注：“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之。”朱熹《四书集注》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

《论语》中孔子实行启发式教学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八佾》中的一章：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子夏）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一章告诉我们：第一，是子夏自己先学《诗》，而不是孔子先教子夏学《诗》。第二，是子夏学《诗》，经过自己思考，在“素以为绚”这一句上无法理解，愤愤悱悱。第三，是孔子在子夏弄不懂的地方加以启发点拨，一句“绘事后素”一下子点通子夏的思路。最后，是子夏一点便透，立刻由“绘事后素”联想到“礼后”（一个人须有忠信之质然后或以学礼），是闻一而知二，举一而反三。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启发式教学实例。

3、强调“思学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2——15）这与德国康德的“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相类。

4、提倡“教学相长”（八佾 3—8）和（先进 11·4）

5、强调“温故而知新”（为政 2—11）

6、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15—36）

7、“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 7—2）

### （三）在鲁从政

孔子的一生在鲁从政，可以 50 岁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他 50 岁以前，他基本是个学者，以讲学为务，有时也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期间鲁国君臣矛盾激化，发生了内乱，鲁昭公被贵族“三桓”打败，流亡国外（并于客死于晋国）。鲁国局势险恶，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孔子对政治感到失望而去鲁入齐，但不久又回到鲁国。后期（即 50 岁以后）则放弃治学教书而从政，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曾经满怀信心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这话既反映了孔子急于从政的心理，也表明了孔子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鲁定公年间发生了季氏家臣的“阳虎之乱”，但很快被平息。在此之后，公元前 501 年，51 岁的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中都宰（鲁国的公邑）。这是孔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担任公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政绩斐然，成为四方学习的榜样。最高官职为鲁国太司寇，位居大夫之列。后来因“堕三都”问题与鲁国的当权派贵族“三桓”发生矛盾，于鲁定公十三年春，54 岁的孔子带着他的部分学生，怀着凄楚悲愤之情，又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企求在别的诸侯国寻找从政的机会，开始了长达 14 年的颠沛游离的生活。

### （四）周游列国（前 497——前 484 年）

公元前 497 年，54 岁的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其目的是游说诸侯国君、寻找出仕行道，实现恢复周礼，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他到过的诸侯国有卫、曹、宋、郑、陈、蔡、齐、楚等国，历经 14 年，失败而归，于前 484 年回到鲁国。此时孔子已经 68 岁的老人了。

孔子周游列国，寻求出仕行道的目标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政治学说远离现实，不合时宜。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子就极不赞同，他认为：“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晏子春秋·外篇》）《史记·孔子世家》载，当齐景公要重用孔子时，晏婴

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天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孔子世家》也载楚国的政治家令尹子西也认为孔子的学说对楚国不利。他对楚昭王说：“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楚昭王听了之后就打消了重用孔子的想法。

不仅各国的当政者不接受孔子的主张，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以外的各学派对孔子的学说也都持批判态度。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对孔子的学说表示轻蔑。

庄子把儒者称为“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庄子·天地》），甚至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

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是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把孔子和儒家的“仁义”主张称为“亡国之言。”（《韩非子·难言》）

汉代司马谈总结六家要旨时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个批评很中肯。

### （五）整理文献、继续从事教育

前 484 年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此时他已 68 岁。

在鲁国，他虽被尊为“国老”，即国家政治的高级顾问，有荣誉但无实权。不但如此，他还与在鲁从政的弟子冉有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矛盾，曾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实现政治理想无希望，晚年的孔子把精力投入到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之中。据说《诗》《书》《礼》《易》《春秋》就是经他整理的，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

孔子的晚年，连续发生了几件很不幸的事，在精神上对孔子打击很大。

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年，即公元前 485 年，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

公元前 482 年，孔子和亓官氏所生唯一的儿子孔鲤也不幸死去，年仅五十岁。这在精神上对孔子的打击更大（古人把幼年丧父、中年丧妻和老年丧子称为人生三大不丧）。

大约在公元前 481—前 480 年，孔子的得意学生颜渊、子路相继去世，年迈的孔子哀恸过甚（颜渊是他心目中的精神继承者）。孔子与颜回，情同父子（俗语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先进》）颜回死时孔子悲痛欲绝，放声大哭说道：“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前 480 年子路死于卫国的一次内乱。子路是跟随孔子时间最长、也是孔子最亲密的朋友和“政事”科的得意学生。其为人好勇、粗鲁，但心胸坦荡、诚实直言，常随孔子左右，充当孔子的护卫。孔子曾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前 479 年夏四月遭受一连串沉重打击的孔子终于病倒，染病卧床七天而终，享年 73 岁。（历来有 73、84 乃人生之大限之说）。《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去世：“孔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歿。”这样的说法已把孔子当作伟人而神话了。这是汉代人的做法。历史上的孔子在去世以后，其形象便开始分离，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主观形象。

孔子死后，灵柩被安葬在鲁国都城曲阜北部的泗水之滨。弟子为其守丧三年，而子贡则在孔子墓旁修筑草庐，足足守了六年。后世到这里拜谒、凭吊这位伟大先哲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在其墓冢周围广植松柏，又刻石立碑，从而形成了孔氏陵园，人们称之为“孔林”。

## 二、先秦诸子对孔子的主观化

历史上的孔子在去世以后，其形象便开始分离，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主观形象。在当时提到孔子最多的四部书中，《孟子》、《荀子》中塑造的孔子形象基本反映着孔子的真实面目，但也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如孔子曾称赞管仲能辅助齐桓公争霸（一是《宪问》16——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谁有他这样的仁性！）/一是《宪问》17——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而孟子则造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的说法，为其倡“王道”反“霸道”寻找理论依据。《荀子·宥坐》中则虚拟孔子诛杀鲁国少正卯之事，赋予孔子实行峻法的形象。

《庄子》和《韩非子》二书中出现了不同的孔子形象。一方面，孔子作为儒家的人物出现，因而分别受到道家和法家的讽刺和抨击；另一方面，他们又分别把孔子改造成道家和法家的人物。如《庄子·人间世》写孔子向颜回面授“虚而待物”的“心斋”，纯粹是道家思想。又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述孔子的严刑令民救火，将其法家化。

先秦诸子对孔子的主观化，是当时百家争鸣的需要，即抬出一个权威人物，为自己的理论张本。他们往往以孔子思想的某一部分作为出发点，加以引申、改变乃至歪曲，也有公然作伪的情况。（详见《孔子研究》1988年第一期张宏生《四种先秦子书中的孔子形象》）

## 第二节《论语》简介

### 一、《论语》的体例

孔子毕生教学，自己却没有留下系列的著述。《论语·述而》有：“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战国时代的墨子则主张述且作）相传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易》、《书》、《诗》、《礼》、《春秋》都是经他亲手整理的古代文献典籍，并被他用作为教授学生的课本。（据后来研究，孔子整理上述古籍的说法并不可靠。我们今天要理解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可信的最基本的文献只有《论语》、《左传》和一些出土的先秦时代的文物等。《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行事的著作。这部传统的儒家经典著作，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伦理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人把它比作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圣经》，是非常恰当的。虽然有些学者指出，今本《论语》（用隶书写成的）的某些篇章可能出于后人的杜撰，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可疑之处，顶多只是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对孔子的不同传说而已，如果我们要了解研究孔子，仍传然只能以《论语》作为最可信赖的材料。

关于《论语》一书的名称，《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语”是古代的一种著作体裁，《周礼》郑玄注云：“答述曰语。”《礼记》注又云：“言，言已事也；为人说为语。”意思是应答而陈述己见的叫“语”。是区别于没有一定对象而直陈（自言自语）的“言”而说的。如明代的《莱根潭》、《幽梦影》则属于“言”。《论语·乡党》有“食不语，寝不言。”即吃饭时不要交谈，睡觉时不要自言自语。《国语》一书就是分别各侯国记载春秋时代士大夫、策士等问答应对的言论的著作。《国语》之前有《训语》，之后有西汉陆贾的《新语》，东汉王肃的《孔子家语》等，都属于这类著作体裁。

据记载，先秦时代史官分记事和记言两类（《汉书》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类“语书”一开始多半是根据记言史官的记录汇编而成的，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种著作体裁了。这样一来，《论语》的“语”既是指孔子及其弟子、时人应对答问的言论，又是一种著作体裁。

《论语》的“论”，普遍认为是编撰的意思。由于汉代时《论语》抄写在六尺长的竹简上，这种长度的竹简一般用来抄写儒生对“经书”的解说之作（曰“传”）所以两汉时，《论语》还有“传”、“记”的别名。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有：“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所引内容出自《论语·子路》。东汉开始则正式称为《论语》。

《论语》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开始于《春秋》末期，成书于战国初期，定名于西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在秦代遭禁查和焚毁后，在民间们有流传。西汉初年有三种不同的《论语》的本子：

<1>《鲁论》，系由鲁国经师保存下来的传本，用当时（西汉）通用的文字（隶书）书写，共 20 篇。

<2>《齐论》，由原来齐国的经师保存下来的传本，也是用当时（西汉）通用的文字书写，共 22 篇，比《鲁论》多《问玉》《知道》两篇。

<3>《古论》，上述两个传书都是用当时通用的文字隶书写的，又称“今文本”。汉景帝时在孔子旧宅发现的《论语》是用战国时期通用的篆体写的，所以又叫“古文本”，简称为《古论》。内容与《鲁论》差不多，只是分《鲁论》的“尧曰”和“子张”两篇，但没有《齐论》的“问玉”和“知道”两篇，故全书 21 篇，这三传本在西汉时各有流传。西汉后期，汉成帝的老师张禹以《鲁论》为依据，参考《齐论》，择善而从，编为定本，即“张信本”。这就是现今通行《论语》的蓝本（简称为“今本《论语》”）。

## 二、《论语》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很早就成为学派内部传述、研究的重点。到了西汉中期，儒家学派被汉武帝确定为统治思想，人们对它研究就更为兴盛，对其注解也历代不绝。到了近代，有关的文献竟达三千多种，真可谓汗牛充栋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东汉郑玄的《论语注》、三国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唐陆德明的《论语音义》、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

今本《论语》共 20 篇，约 480 章，16500 字。每篇又分为若干章，各篇基本没有一个统摄的中心。后人均以其各篇的第一章第一句开头的两三个字作为篇名。如《学而》篇，即取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学而”两字作为篇名的，其他也这样。王充《论衡·正说篇》说：“《论语》者，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王充的这段话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论语》最初形成时多达百数十篇，汉代出现的二三十篇仅仅是残剩的而已。这样的观点可以在《孟子》一书中找到证据。《孟子》引用孔子言论有 40 多处，但见于今本《论语》的只有十几处。《荀子》所引孔子言论则未见于今本《论语》。

《论语》作为一部语录体文集，其内容涉及政治主张、教育思想、伦理观念、道德修养等方面。行文多为对话体记录，为语录体散文语言的典范。其中有不少总结社会及生活经验的言论，后来发展成为格言或成语（有 160 多条），对后代文学语言有很大的影响。

《论语》的内容,从全书的整体看,其中心思想是孔子所不遗余力倡导的“仁”和“礼”(整部《论语》谈到“仁”109次(其中,作为孔子的道德标准的“仁”达105次);谈到“礼”有79次)。谈到“道”89次;谈到“德”40次;谈到“信”38次;谈到“义”24次。

“仁”是孔子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抽象地说,是“爱人”——人之间要关爱,但“爱”只是对于“人”,即统治阶级内部的各阶层而言,是不包括“民”的,“民”是役使的对象,不是关爱的对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9)“……,其使民也义。”(《公冶长》16))

孔子竭力维护的“礼”,即周礼,是西周初期在夏商礼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等。其内容大都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秩序的东西。孔子的“仁”和“礼”是互相结合的,他提倡“仁”是为了恢复正在崩溃瓦解的周礼。“克己复礼为仁”(《颜渊》1)——“仁”就是要约束自己的私欲,恢复崩溃中的周礼,这是孔子关于“仁”的基本定义。在孔子看来,“仁”是手段,恢复和巩固周礼才是目的。这才是孔子的政治学说和伦理思想的核心。“不学礼,无以立。”“人而不仁,如礼何?”人的一切言行,无论是治国为政,还是安身立命,都要以“礼”为根本。所以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1)清人陈澧说:“《论语》言礼者凡四十余章……莫不比礼。”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度崩溃的时代,他所提倡的“仁”和“礼”的思想主张,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观念,是为了挽救和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地位而发的,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正在取代奴隶主的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反对。但在地主阶级革命时期破坏过的以维护奴隶主制的“礼”为中心的上层建筑,因为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两者都是等级主义的社会制度。因此封建统治者借助了孔子所提倡的“礼”是思想体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的是单纯的法治,一味镇压,忽视了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相应的办法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因而很快灭亡。汉代统治者接受其教训,最后选择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从意识形态方面来加强自己的封建统治。两汉初期,刘邦到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去祭祀孔子,并用叔孙通定朝仪,以树立和巩固天子的尊严。西汉中期汉武帝刘彻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最高代表。至元代孔子被封为“大圣至成文宣王”。清代康熙皇帝,称孔子为“万世师表”。

主要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也被奉为圣人经典。西汉初期《论语》还不称“经”,当时人们引用《论语》多用“孔子曰”,“传曰”。到了东汉,《论语》便被提到“经”的地位。由于《论语》相对于《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较为通俗、易懂,适合作为启蒙读物,所以是儒家经典中流行最广泛的著作,其中的不少“圣人之言”,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立身处世,安邦定国的准则,所以是儒家经典中地位最重要的著作,对中国社会统治思想和人们文化心态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的经籍,汉代有“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到了唐代,有了“九经”(即《诗》、《书》、《易》、《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至唐文宗时,又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成了“十二经”。到宋代,又将《孟子》列入经部,这样就有了“十三经”。

## 【作业】

读一部中国通史,重点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文化特点、孔子的生平情况及儒家学派的特点。

## 第二讲 “中庸”之道

### [教学目的]

通过本专题相关章句的研读，了解孔子以“中庸”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观。

### [教学方法]

提问法、讲读法

### [教学内容]（章句研读）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和：和谐、得当。由：遵循。）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矣！”

（攻：学习、钻研。异端：事物的两极；异：不同的。）

3-20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注：“淫，过分、放纵。伤，伤感”。孔子认为，这首诗表达感情含蓄委婉，“发乎情而止乎礼”而加以称赞。）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dì)也，无莫也，义之与比(bì)也。”

注：“适”：许可。“莫”：不可。据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注云：“适、莫犹厚薄也。”“义”是孔学中仅次于“仁”的道德观念。在这里，孔子认为人的行为必须以义来规范。如“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也然。“比”：依从、靠近，或作“从”，亦可解。

6-18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29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说明：《礼记·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以“中庸”乃天下之至德。“中庸”就是“中和之为用”，即“用中”的意思。

从道德伦理学角度看，“中庸”是一种至高的美德。这有其正确性。如：“鲁莽—勇敢—怯弱”、“自负—自信—自卑”、“拘谨—慎重—轻率”、“骄傲—谦虚—虚伪”等，但它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别的方面则不然。如“进攻—防守—撤退”、“正面—侧面—反面”。)

8-2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蒺(xī)，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说明：蒺，胆怯、懦弱。绞，尖刻、固执。笃，厚待。偷，淡薄、苟且。有论者认为后半章应另作一章。）

9-4 子绝四：毋(wú)意、毋必、毋固、毋我。

（注：“毋意”即不意气用事，不主观臆断。）

13-21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yù)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说明：狂狷：朱熹《集注》云：“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zhì)未及而守有余。”）

13-23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说明：和：和谐，团结。同：同流合污。本章与“2-14”义近。

14-32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nìng)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注：佞，恃口才奉承讨好他人。栖栖者，不安居、忙碌的人。疾，用作动词，义为讨厌、拒绝。微生亩大概是位年长的隐士。这一章反映了孔子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道主张，但在答辞上十分审慎谦恭。

11-16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说明：师和商分别指孔子的弟子子张（姓颛孙名师）和子夏（姓卜名商）。据《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从《论语·子张》第三章（子夏之门人问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主张（或才智）不同，子夏的态度（至察至清）固然偏狭，但子张的态度（即来者不拒）也失之于过激。

以“过犹不及”来考察“中庸”之道，可见孔子运用了“三分法”。“过”与“不及”是两端，即“异端”，加上“适中”即为“三”，这种分法从伦理道德上有其正确性。

• 15-18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xùn)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说明：“君子”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此章说的是君子的表现或成就君子的途径，从中可以看出其言行无不恪守中庸。

• 补充：

①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

——《中庸》

• ②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孟子·尽心上》

## [孔子中庸之道小结]

《论语》中孔子的思想所蕴含的辩证精神集中体现于“中庸之道”。下文就此从两重视角（即“思想诠释”和“价值审视”）对中庸思想加以诠释并认识其文化价值。

### 一、思想诠释

东汉郑玄《中庸解题》将中庸注解为“用中”说：“名曰中庸者，以记其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

北宋程颐讲：“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南宋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四书集注》）

杨伯峻释“中庸”为“最合理而至当不移”。

#### （一）方法论原则

其方法义具体表现为：

1、允执其（厥）中——诚实地守中

2、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这既包括思维方法（认识矛盾）又包括处事原则

（处理矛盾）。如：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子罕》9-8）

意指从问题的首尾本末发现矛盾，从事物的矛盾双方加以分析，再把问题综合起来予以回答。

实现中庸，必须达到两点：

第一、看问题、做事情全面而不偏执，要讲求包容精神，追求事物和谐。如：

（1）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6）

（2）“闻斯行诸？”“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22）

（3）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15-28）

第二、在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多样的统一，这种原则在行为方面集中表现为适中（适度）、恰到好处。如：

（1）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14）

（2）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3-23）

（3）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作为方法论，中庸渗透于孔子思想的诸多层面（如，为人处事、文艺等）。

在理想人格层面，其一，它表现为行为举止既不过头，又不欠缺，即道德规范上有所节制。其二，它体现为既不求他人与自己意见绝对一致，又有独立见解，即待人处事中兼容并蓄。孔子还讲“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dī）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4-10）因此，“中行者”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勇于进取而又考虑全局，为人正直而又与人合作，能够实现节度精神和兼容精神的统一。

（二）理想精神境界。

中庸不仅是方法论原则，更可归为“仁”的理想境界，即恪守“善道”。中庸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智慧。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实现“中庸”原则的途径是“择善而固守”。一方面，“执中”在现实中是以“执善”来彰显的。中庸本身含有“善”（或“义”）的价值取向即中庸取向，能够符合‘中’的标准，才是‘至善’；偏离‘中’的‘过’或‘不及’，就是恶。“善”再进一步就是“仁”。可见，作为处世准则的“中庸”同作为道德理想的“仁”是一致的。二者统一之点在于实现身心、人际和谐的终极目标。

另一方面，庸德总的来说是种不易之道。“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换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回。即用“道”来决定自己的进退出处，以弘道自任。反映了儒家“中道而立”、特立独行的执着品格。所谓“君子固穷”正是一种中庸精神，“和而不同”便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其中，“不同”即“固”（意即有节制）。

所以，“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准则和矛盾观及处理矛盾的方法论。

## 二、价值审视

中国民族最讲持中之道，中国儒家学说的根本思想便在中庸之道。

中庸对国人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它教人言谈举止上讲究分寸、适可而止，处事寻求合宜状态。这便逐渐塑造了处事恭顺、恪尽职守的民族心态。然而，它又包含了向均衡论转化的可能，且有“宁不及勿过”的戒惧之嫌，加之中国人谋求行动体系和谐共处和“向后看”的传统心理，便演化成为一种趋同避异、安于既往的价值倾向。

其次，它影响到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融而圆通、和而不同。这便使得中国文化极少被异质文化所同化，却总是化解对方及其价值冲突，使之中国化而非本土外化（异

化)，有利于保持民族的自性，然而，它又使华夏文化持守有余而开放不足，加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封闭的民族特质，导致外来文化的精神内核难以介入，不利于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华夏文化五千年来从未发生过文化断裂，不但是民族的骄傲，而且是民族的缺憾。综上，中庸哲学实质是种“和谐的辩证法”——同时观照两端(矛盾双方)，而非任何一端(其中一方)，这与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辩证运动的规律是一致的。

### [思考与作业]

结合资料对本专题“中庸”之道作拓展认识。

## 第二专题 “仁”的学说

### [教学目的]

通过本专题相关章句的研读，了解《论语》中孔子“仁”的学说，并引导学生分析、总结《论语》中“仁”作为伦理道德在几个层面上的表现，让学生明确“仁”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学习中借鉴扬弃并努力内化为自己的品格。

### [教学方法]

提问法、讲读法

### [教学内容]

#### 相关章句：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4-1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长处约，不可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6-22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6-23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6-26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6-30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7-26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7-30 子曰：“仁者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7-34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9-1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10-12 厩焚，子既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12-3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曰：“其言也讷，斯可谓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讷乎？”

12-22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2-24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13-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13-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3-26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13-27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14-12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14-23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15-24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5-28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17-6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17-21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宰我）曰：“安。”

（子曰：）“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

## 专题分析总结：

### 一、《论语》中的“仁”概述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縢》：“予仁若考。”这个“仁”字，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

《论语》中，孔子贵“仁”，曾从多个角度对“仁”进行了论述，但却没有给“仁”下过一个定义。而《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09次，大多数是出现在孔子回答别人怎么修身成“仁”的句子中，而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仁”的深该内涵。《论语》中关于“仁”的学说，就是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它包含新旧两部分的思想内容。

#### （一）孔子“仁”学中的旧观念

孔子提出“仁”，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当时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开始动摇，传统的礼制渐渐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社会上出现了下越上、贱越贵的局面。当时周朝疲敝，孔子提出自己的观点：“殷因于周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学而》2-23）孔子是讲历史循环论的，朝代可以更替，但作为制度的“礼”总是需要的，可以根据时代的变迁加以调整但不能废弃，而人们之所以需要礼乐，不是因为其形式，而是因为其中所寄予的“仁”的思想。

《论语》关于“仁”比较全面的论述是《颜渊篇》（12-1）中孔子与颜渊的一段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里，孔子首先说明了“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周礼的规范。其次，孔子说明了求“仁”完全是自觉的，并不依靠他人。再次，说明了求“仁”的具体条目，即必须在视、听、言、行方面符合周礼，“仁”是一种全面的伦理道德行为。孔子这段话突出了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理解仁，这是仁的旧观念（即复礼）。

孔子还把“亲亲”作为“仁”的一条原则。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1-2）“孝”是指贵族内部人人要孝敬父母，孝敬祖先；“弟”是指同辈兄弟姐妹之间要相互亲爱，孔子把“孝弟”说成是“仁”的根本，这是西周奴隶制宗法社会的深刻反映。其社会特点是宗法即等级、伦理即政治，族权与政权、君权与父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家国同构”。因此在家族内部对父兄尽孝，就能（是）在政治上对君主尽忠。孔子说：“孝慈则忠。”（《为政》2-20）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可见，孔子提倡“孝弟”为“仁”之本，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这也是仁的旧观念。

## （二）孔子“仁”学中的新观念

《论语》中孔子对“仁”也灌注了新意。这主要表现在：

1、他提出来了“仁者爱人”（《颜渊》12-22）的观点上。但孔子讲“仁”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17-4）但“爱人”的主张，强调了人道的原则，仍具有进步意义。在《乡党》（10-12）“厩焚”一章及（《子罕》9-26）“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的陈述，则反映出孔子对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认识比以前深入，也承认和肯定了人的人格。

2、孔子不仅用“爱人”来解释“仁”，而且提出“忠恕”来作为实行“仁”的途径。他的学生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就是孔子的行仁之方，即用推己及人的方式来实行仁。孔子讲“推己及人”，实际上是以两个原则为前提：一是人道原则，即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即肯定人同此心，每个人的理性都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行仁之方也。”（《雍也》6-30）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就是强调道德行为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理性）的要求。这种尊重理性的态度，在当时是新观念，对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具有破坏活作用。

## 二、《论语》中“仁”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一）政治伦理层面：“克己复礼为仁。”（《颜渊》12-1）有了“仁”，才会有“礼乐”的格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3-3）社会才有一定的政治秩序；有了“仁”，就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3-19）君臣才有忠义。

（二）家庭伦理层面：有了“仁”，才会有“孝悌”的观念，家庭才有了基本的人伦守则。

（三）社交伦理层面：有了“仁”，才会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1-7），社交中才有诚信和友谊。

孔子讲仁者“爱人”，不仅是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上的统一，同时也是“情”和“理”的统一（见《阳货篇》17-21中“三年之丧”的讨论）。这是孔子“仁”的学说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他哲学中理性主义的表现。

## 思考与练习

1、写一篇本专题的学习小结并作拓展，注意“仁”的学说的的发展。

## 第三讲 孔子的交友之道

### 本章教学目标和要求：

- 1、结合师范教育专业的实际，了解儒家经典《论语》中交友思想的章句；
- 2、总结《论语》交友思想章句，形成结构认识；
- 3、通过教学了解，加深对古代交友智慧的认识，丰富学生的社交知识。
- 4、本专题需要4学时。教学内容与课件相结合进行。

### 教学内容：

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说过：“朋友就像阳光一样。”阳光带来光明与温暖，朋友则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与朋友的交往主要是靠缘分。缘分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一、缘有长短，有些人是一辈子的朋友，有些人可能只是短暂相逢；二、缘有深浅，有的人可以成为生死之交，有的人只能握手寒暄；三、缘有好坏，亦即所谓善缘和孽缘。交朋友往往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通常需要各种条件的配合，“缘”指的就是具备了相关的条件。

孔子交了许多朋友，他和朋友交往时所持的价值观很特别，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乡党》里的这句话：“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意思是：朋友送的礼物，只要不是祭祀祖先所用的祭肉，即使是车马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也不会作揖拜谢的。朋友送来祭祀祖先是祭肉，虽然价格远远不及车马，但是朋友在祭拜祖先时还想到我，就表示把我当成他家族的朋友，情意深重，当然要拜谢。他重视精神价值远超过物质价值。

《乡党》里另一段记载：“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过世而没有人料理丧事，这是很困窘的情况，孔子知道之后就主动表示愿意负责丧葬事宜，一死一生乃知交情。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于朋友的态度，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对朋友特别豪爽，因为子路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子路愿意把他的车、马、衣服和朋友共享，即使使用旧用坏了也都不会有任何遗憾。子路重视朋友远超过财物，实在不是一

般人做得到的，这多半也是由于孔子思想的启发，才会选择这样的志向。

## 交友的原则

孔子认为若想交到好朋友，需要留意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是志趣相近，理想相同。他说：“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意思是：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原则，不与志趣不相似的人交往。在此，“不如己者”不是指比不上自己的人，因为你若拒绝比你差的人，那么比你好的人又为什么要与你为友呢？“不如己”是指志趣与自己不相似的，如此则不必勉强交往。

第二是真诚相待，亦即所谓的“忠告而善导之”（《颜渊》）。忠告就是真诚劝告，善导就是用有效的方法来引导。接着是“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这同样是指交友不可勉强之意，因为人在经历生活环境的考验时，也可能改变志节。如果我对朋友坦诚相劝，行不通就停下来，以免自取其辱。交友也有缘尽于此的时候，不妨互道珍重。

第三要寻找“中行”之人为友。“中行”是指言行恰当，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的意思是：如果找不到中行之人为友，则一定要与狂者交往，一起向着远大的目标奋斗。如果找不到狂者为友，那么，至少要与狷者为友，洁身自爱而有所不为。对许多没格调、不入流的事，不是不敢做或不会做，而是不愿违背原则、决不妥协。比如考试作弊、暗中搞些小动作、伤害别人的事情，当然是有所不为了。孟子曾特别强调狷者，认为有所不为的人才能有所为（《孟子·离娄下》）；人生不能什么都要，必须有所取舍。因此，交友最高的理想是“中行”，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言行合宜，当狂则狂，当狷则狷。交朋友要以上述三个原则为标准。

如果在孔门弟子中寻找这三种人，则颜渊接近“中行”的标准，能在贫困生活中以道为乐；曾点则是典型的狂者，孟子也特地以他为例说明所谓狂者。至于狷者，则是闵子骞了，因为他婉拒了季氏的任命（《雍也》）。其中关于曾点的格式，值得稍加介绍。

《先进》里记载，有一次孔子吩咐四个学生谈谈志向。子路自认可以在政治及军事上有所成就，冉有志在治理小国，公西华则想做个礼仪主持人。到了曾点时，他居然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

舞雩，咏而归。”意思是：暮春三月时，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我陪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小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孔子听了，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我欣赏曾点的志向！”

严格来说，这不算志向，只能算是生活的情调，但是孔子却说欣赏曾点的志向，理由是：一、天时。春天快结束的时候，不要去想夏天、冬天的事情；二、地利。靠近沂水，就去游泳，有舞雩台，就去吹吹风；三、人和。五六个大人，六七小孩。当天时、地利、人和，配合起来之后，感觉到生命当下每一刹那的喜悦，人生才会有自在愉快之乐。

到了《孟子·尽天下》，就描写曾点等狂者，说：他们志向高远，开口就说“古人如何，古人如何”，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与他们的言论未必吻合。与这种狂者为友，实有大快平生之感。

## 成为朋友的四个层次

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孔子把朋友分成四个层次：共学、适道、立、权。

“共学”是指一起在老师门下求学问道。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只要有心就可以得之。从小到大，与我们一同念过书的朋友，都属于这个层次。念书结束，离开学校，就看个人选择的发展途径了。

“适道”是指由于志同道合，选择共同的途径发展。这种途径并不限于同一行业，因为同行未必是同志。真正的同志是针对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而说的。我们在学校所学做人处事的道理，现在是否要付诸实践呢？此时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即使可以一起“适道”，未必可以一起“立足于道”。这是因为每一个人所下功夫不同，人生际遇也有别，结果在立身处世方面所达到的境界随之出现了差距。许多朋友明明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几年之后有成有败，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无法立足于同样的境界。

最后，还有一起“通权达变”的朋友。这是最困难的事。做人不能没有原则，原则又不能陷于僵化，那么我们要找谁商量呢？“通权达变”可能被人误解为投机取巧，或被人批评为妥协主义。只有真正的知己，才明白我的苦心与用心，才

了解我的心志与抱负，相信我的做法是出于坚定的原则，为了达成可贵的理想。

如果厘清以上四种朋友的层次，我们与人交往时就可以较为坦然了。

## 好朋友可以丰富生命的内涵

孔子肯定的“益者三友”是：友直、友谅、由多闻（《季氏》）。

第一是友直。“直”是指内在的真诚和正直，“直”是益友的首要条件。朋友是在性格上坦诚相见，毫无隐瞒的。《世说新语·商誉》记载，王述在丞相王导府中担任幕僚，经常在聚会讨论时，丞相一发言，众人就争相赞美。王述的反应如何呢？他说：“丞相又不是尧、舜，怎么可能每件事说得都对呢？”王导不但不责怪，反而十分欣赏。王述对王导来说，虽是幕僚，但合乎“直”的要求。同样的，子路对孔子来说，虽是学生，但也多次直言劝谏孔子（如反对他去见南子）（《雍也》），也合乎“直”的要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是友谅。谅有两个含义：一是守信用；二是体谅。儒家对于守信用有非常精彩的看法，在此以管仲的故事为例。

春秋时代，齐国出现内乱，公子纠和小白两位公子同时逃亡到国外，谁先回国就可以当上国君，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有两名君主，因此产生了激烈的竞争。这时候管仲和鲍叔牙这对好朋友，决定一人跟随一个公子，将来无论那一个人成功了，就一定要救另外一个人。

结果管仲选错了，鲍叔牙选对了。公子小白后来成为国君（齐桓公），就对鲍叔牙说：“你来当宰相吧。”鲍叔牙说：“不行。如果要成就霸业，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您，那就是管仲。”齐桓公说：“别人还可以考虑，管仲绝对不行！管仲是我的仇人，我还想杀了他呢！”因为当初与公子纠争先回国的时候，管仲曾经一箭射中齐桓公的腰带环钩，只要稍微高一点或低一点，齐桓公可能就没命了。鲍叔牙很坚持：“您真想成就霸业的话，就一定要再考虑一下。”

不久齐桓公收到一些情报，于是对鲍叔牙说：“你知不知道管仲和你在一起做生意时，私下多拿了不少钱？”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家里有老母亲，他这样做是为了奉养老母亲。”齐桓公又说：“你知道管仲打仗时好几次都临阵脱逃吗？”鲍叔牙说：“因为他家里有老母亲啊。”齐桓公没办法，只好说：“好吧，既然你如此大力推荐，我就用他吧。”这时候因为鲁国想讨好齐国，于是把管仲、

公子纠都抓了起来。齐桓公说：“公子纠，你们看着办；但是管仲，我一定要亲自杀他。”鲁国信以为真，果真把公子纠杀了，然后把管仲押解到齐国。一过齐境，齐桓公就称管仲为“仲父”，拜他为相。齐桓公能成为春秋第一霸，靠的就是管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鲍之交”。

第三是友多闻。就是强调身为朋友的，平常要各自博学多闻，见面才好互相交换看法，这也是一种心智的成长。曾参说“君子以文会友”（《颜渊》），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博学多闻的人，才有文化素养和能力，和这种朋友交往，才能丰富生命的内涵。

谈到“友多闻”，那么孔子本人可以当之无愧。《国语·鲁语下》记载，吴国攻打越国，在会稽山找到一副骨架，一节骨头就要用一辆车才装得下。吴王夫差派人去鲁国时，特地请教孔子：“什么骨头最大？”“什么样的守君能成为神？”“防风氏是什么守君？”“人体最长的是多少？”孔子一一回答，答案是：防风氏的骨头最大，他是守护封、嵎二山的君主；山川的灵气足以规范天下，其守君死后就成为神；最后，人最长可至三十尺。若有孔子这样的朋友，谁不会受益良多呢？

## 谨慎戒惕，远离三种坏朋友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这是孔子所说的三种坏朋友。

首先，“便辟”，是指喜欢装腔作势、爱摆门面，有外表而无内涵。其次，“善柔”，是指专门顺从别人的意思，刻意逢迎讨好。这种朋友带来的坏处，会让你以为自己真的很好了，也就不会再进步。第三，“便佞”，是指巧言善辩，口才很好，可以颠倒是非黑白，什么都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碰到这样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喜欢装腔作势的，刻意从献媚的，巧言善辩的，对这三种人都要谨慎避开。

《论语》里也间接谈到友谊的内涵，《季氏》里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意即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

三种有益的快乐，第一是“乐节礼乐”。用礼乐来调节社会的快乐。生活是细水长流，这一生如何能从小到老一路发展下去都很顺畅，这是很大的挑战，如果能用礼乐调节，让人与人之间情感调和，维持适当的关系，分与合都自然，生命才有圆融与秩序。第二是“乐道人之善”。也就是喜欢称赞别人的优点。第三

是“乐多贤友”。“贤”是指杰出，乐于交往许多杰出优秀的朋友。因为朋友如果卓越，也代表自己有相当的水平。

孔子谈到的“损者三乐”则值得戒惕。第一是“乐骄乐”。以骄傲自满、被人吹捧为乐。这是普遍的现象，但这种“乐”会有害处，因为老爱与别人比较，总希望胜过别人，胜过别人就会骄傲；反过来被别人胜过的时候，心里自然不好受，就会自卑。第二是“乐佚游”。“佚游”是指每天到处玩乐、游手好闲。第三是“乐宴乐”。“宴”是指每天大肆欢宴、饮酒作乐。这三种快乐使人不思长进，所以是有害的。

## 友谊贵在久远

孔子的学生司马牛曾抱怨：“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别人都有兄弟手足，只有我孤孤单单。子夏听了司马牛的抱怨，就告诉他，老师曾经说过：“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意思是：作为君子，言行就要慎重认真，没有任何闪失，与别人来往能够自我约束，合乎礼的要求，自然也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了。凡事秉持敬与恭的态度，自己努力行善，从遵守规范开始，如此想拥有珍贵友谊绝不是问题。

所谓“人性向善”，是认为四海之内的天下人都是一样的，因此你只要行善，别人就会同你呼应；如果你是恶，别人自然讨厌你。交朋友也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互相尊重、彼此帮助，人与人之间自然就会产生良善的沟通情谊。

孔子曾说晏平仲这个人，很善于和别人来往，“久而敬之”（《公冶长》）。因为他随着时间长久，更能得到朋友的尊重，愈是能让亲密关系的人尊敬，代表此人于公无私、外表内在皆一以贯之，人性的挑战也就在这里。我们时常要自问与朋友来往，时间久了之后是否有分寸，有分寸才能长久。

庄子对交朋友的道理也有深刻的认识，《庄子·山木》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水是很平淡的，但生生不息。君子交往的时候不需要太多激烈的情绪，却可以日久天长；“醴”是古人酿的甜酒，与小人交往的时候，开始时甜蜜得像甜酒一样，却很难长期发展下去。

对于“朋友”的定义，我有两个简单的描写。

第一，朋友是一起创造回忆的人。比如一起学习的同学，相濡中一起合照的

人，都曾经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发出交会的亮光。生命是由一个个阶段所组成的，好朋友总希望能长久在一起，但是每个人的际遇终究不同，那也不要紧：“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第二，朋友就是在背后为你辩护的人。如果有人背后批评、非议你，听到这些批评就勇于出面为你辩护的，才是真朋友。

无论是老师、同学或朋友之间，都要有共同的理想，也就是所谓“亦师亦友”。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它把“善”界定在自己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与任何人交往时，都要问：这样的关系适当吗？如何一起努力使它变得更适当、更美好？拥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奋斗，才容易完成共同的理想；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更需要许多人的努力。儒家思想推广以后，让每个人都从真诚出发，朋友之间不管缘分或深或浅，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肯定，孔子可以作为我们效法的对象。而谈到重视情谊，愿意与朋友共享车马衣裘，被用坏了也毫无遗憾的子路，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表率。朋友间的交情使人格的尊严得以充分实现。

## 第四专题 孔子的学习观——悬生知而重闻见（略讲）

### [教学目的]

通过本专题相关章句的研读，了解孔子重视“闻”、“见”的学习观，从而引导学生总结《论语》中孔子相关的学习理论并以之作为借鉴。

### [教学方法]

提问法、讲读法

### [教学内容]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且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用日少而蓄积多，三十而五经立。”《礼记》有“三十曰壮，有室。”刘宝楠训“立”为“有所成也。”）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前人对此有两种解释，一说是通过旧有的知识而得到新的体会；一说是既不遗忘旧有的知识又学习新的知识。此章与 1-1 义近。）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18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此章与 7-20 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相合成本专题之纲。）

4-8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

（此章用“朝”“夕”相对，以言求道之迫切心理。）

5-15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卫国大夫孔圉，“文”是他的谥号。《谥法》云：勤学好问曰文。诸侯帝王的谥号“文”则是“经天纬地”之意。敏：勤奋。）

5-28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十室之邑：喻人少。古有“四井为一邑”之说，八家为一井。）

6-11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陋巷：颜回家贫，所居陋狭，故称其家为陋巷。参考 1-15 之“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6-13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即卜商，孔子曾赞其“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又谓“商也不及”，但许其文学。儒：诸侯保氏有以教六艺者。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子夏于时设教，有门人，故夫子告以为儒之道。此章可与 15-32 “君子谋道路不谋食”相参。）

6-20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此章可与 6-11 和 7-19 并解。）

学问知之者，不如好者笃；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深。）

6-21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又认为人分上知、中知和下愚，故谈话答述需因人之才知而语之。同时，也说明了学习上的循序渐进。）

6-27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君子乃成德之称，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弗畔：郑玄注为“不违道”。前两句于朱熹《近思录》中则缩略为“博文约礼”。）

7-1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遵循，传述。老彭：一说是商代贤大夫，传说他长寿而好述古；一说是指老子和彭祖。）

7-2 子曰：“默而识(zhì)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首句有作“不言而存于心”或“不言而心解”讲。后一句是自谦。这三条既是孔子教育他人的准则，也是自身行为的写照。）

7-3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指出不能只重读书而不重德性，只重言谈不重实行。是自勉，也是对他人的期望。）

7-6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据、依：均有执守不违背之意。游于艺：朱熹《集注》云：“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依：倚也。艺：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游：刘宝楠云：“不足依据曰游”。切合君子儒之义。）

7-14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三月”句有解为“食而不知其味”，《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3-25 孔子盛赞《韶》为“尽善尽美”，此处则又表现为之吸引和专注之情。）

7-19 叶(shè)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于道]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可结合 7-15 和 7-16—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7-20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中孔子的“自我鉴定”很多，这是其一。他把“敏以求之”作为自己取得学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强调后天学习的表现，这是非常客观的，是唯物的。荀子于《劝学》中强调“学不可已矣。”郑玄曰：言此者，劝人学。正义曰：生知者，不待学而能知也。但《论语》中孔子对此却虚悬一格而以自己的行动型诸于人。）

7-22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

（人各有优缺点，要注意学习借鉴。可见子贡所言“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的评价并无差谬。结合 4-17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可见孔子非常强调学习上的个体主动性。）

7-34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8-17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正义曰：如不及者，方学而如不及学也。犹恐失者，既学有得于己，恐复失之也。学自外入，至熟乃可长久，故如是说。）

9-19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kuài)，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

（簣：一种盛土的竹器。《荀子·劝学》首句借君子之口申明“学不可以已。”又言“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说明学习和修身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能轻易放弃。成语“功亏一簣”即源于此章。）

9-21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惜乎：实为勉励之辞。可结

合 6-3 “有颜回者好学”、6-11 “回也不改其乐（道）”和 12-1 之“回也不敏，请事斯语矣。”来解读。前两章是孔子称赞颜回好学，后一章则是颜回和自勉。

11-15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升堂入室：喻学道由浅入深。《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说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尔奚不谓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参考 2-2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和 15-11 “……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说明为乐要有利于仁德修养，学习内容要有选择性，不能良莠不分。）

14-35 子曰：“莫我知也乎！”

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正义：莫我知者，夫子叹己不见用。《史记·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强调需加强自身的修养的道理。）

15-3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未句大意为：仅仅“多学而识之”还不够，必须以基本观念来贯穿所学的知识，方才不致于泛滥无归。这可与 2-15 “思学并用”和“下学而上达”相联系。）

15-31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可与 2-15 “思学并用”联解：知行要合一，但“行”更重要。）

16-9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承认人的天赋不同。“生而知之”者（学识与道德与生俱来者）乃孔子虚悬一格之辞。“学而知之”，即主动学习；困而学之，即被动学习。学与不学是“下愚”的分界线，所以孔子强调后天学习。）

17-2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孟子》云：“生之谓性。”性者生而有之者也。）

17-3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19-5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亡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日知其所亡，是知新；月无亡其所能，是温旧。可与 8-17 的“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及“温故而知新”联解。）

19-6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章讲成就仁道的途径。切问：努力探索。近思：按宋代程颐的解释是指“以类而推”，合理思考联想。循序渐进地去把握大道。朱熹和吕祖谦所编纂的宋代理学言行录即据此以题名为《近思录》。）

19-7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致：达到、获得。此章以工匠的工作为喻，形象地说明学习对于君子成就大道的主要性。《礼记·学记》云：“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居学”塾、庠、序之处所也。）

19-13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章可与 1-6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句相联读。《说文》：优，饶也。饶，余也。周制：凡大夫、士幼则受教于官学，成人而学优者则仕于公门。其未曾受教于官学，但仕而优者，亦得入学于塾、庠、序、学。本章说明

了仕与学两者在当时社会政治中的关系。)

19-22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文武之道”几无所不包。“在人”者，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5-29）之义。孔子自述“好古，敏以求之者。”又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法文武。……大道之传于尧舜，递至我周，制作礼乐，于是大备，故言文王既没，其文在兹。”首句后人概括为“斯文在兹”。此章既颂扬孔子好学，又点明了孔子学问的精髓是“文王之道”即以仁为中心的德治。)

### [说明]

1、本章的学习与检查对《论语》全文的通读相结合，教学上以提问学生对章句的理解和教师的适当点评为主，不作总结。

2、本章与《文质并重修辞观》安排课程小论文写作，作为期中作业。

## 第五讲 “慎言”论章节研读

### [教学目的]

通过本专题相关章句的研读，了解孔子以“仁”和“中庸”为核心思想指导下的文质兼求的修辞观。

### [教学方法]

讲读法、提问法

### [教学内容]

1-0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

1-13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2-18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5-10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

子曰：“吾始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10-1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意为恭顺温和），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旧说通‘辩’）言，唯谨尔

10-2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意为和乐）；与上大夫言，訚訚（yín，和悦）如也。君在，蹀蹀（cú jí，恭敬而不安）如也，与与（威仪适中）如也。

11-6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见《诗·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11-14 鲁人为长府，闵子耕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也不敏，请事斯语矣。”

12-3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

曰：“其言也讷，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讷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司马牛有“言多而躁”的缺点。）

12-8 ……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驷不及舌。”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硠硠然(kēng, 固执义。)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shāo, 孤陋寡闻。)之人，何足算也？”

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gǔ)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

14-20 子曰：“其言之不怍(zuò, 惭愧)，则为之也难。”

14-22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14-27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或作“之”）过其行。”

15-17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15-18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15-23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15-27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16-6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qiàn)：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盲目性)。”

17-19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注：《礼记》载孔子云：“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这里说的就是孔子的“不言之教”，可与《为政篇》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互参。此“无为”并非道家的“无为”。）

## 【“慎言”论研读小结】

一、慎言的目的——在乱世中如何保持儒家道德修养。

（一）常言道：“言为心声”，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是个人内心世界和思想的直接现实。孔子所处的时代既是“礼乐崩坏”、“天下无道”，又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人们各行其是，思想和行为的社会规范丧失殆尽。所以，孔子认为，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要以做一个“克己复礼”的“仁人”来规范和约束自己。要“非礼勿言”，注意道德上的自律。虽然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只有把自我修养作为一种自觉需要，才是仁人和小人的分野，才是朝“君子”这一理想人格发展的自我塑造。

（二）孔子的世界观是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积极入世的，是经世致用的，其哲学思想是一种实用理性。孔子强调“慎言”在于明德立德，是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例：《子路篇》（13-15）有：

“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阳货篇》（17-18）有“恶利口之覆家

邦者。”

孔子主张“慎言”也是出于对语言的社会性功能的清醒认识，即既肯定个人语言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又不夸大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中庸”思想在言语交际中的体现。

## 二、《论语》“慎言”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言说场合之慎

首先是大的政治气候。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

其次是具体言说情境。

“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乡党》）又“过位……其言似不足者。”

以上四种情形表明，孔子居身处世，在不同场合注意得体地作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言语表现，未尝有不慎于言（但也绝非机械木讷，而是本着仁、礼等儒家伦理原则，如“当仁不让于师。”“勿欺也，而犯之”等）。

### （二）言说对象之慎

首先，对尊长，讳言其过；劝谏不失敦厚；谈敏感的事情要含蓄委婉。如《述而》（7-31）有：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子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之，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鲁昭公娶吴国同姓女子作夫人，孔子却违心地称之为“知礼”。又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4-18）

子女对父母的过失，孔子则认为要不违孝道。

对老师，当谈及敏感的话题时要慎以言之。如子贡以“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罕》9-13）设喻比托探问孔子出仕的态度，含蓄巧妙，避免了可能引起的尴尬和不快。

后人称此为“三讳”（为尊者、亲者、长者讳）。

其次，要以相应言谈情态礼遇不同政治身份的人物。如描述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诃诃如也；君在，蹀蹀如也，与与如也。”（《乡党》10-2）又“……过位，色勃如，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乡党》10-4）

此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慎重选择哪些人可与之说，哪些人不可与之言说。如：

① “不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卫灵公》15-8）

②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雍也》6-21）

### （三）言说内容之慎

罕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又，“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

不言：“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

总之，对那些不但不容易说清楚反而可能引起更大迷惑的道理（如“性”与“天道”）以及那些儒者所鄙斥的事项（如“利”、“力”、“乱”等），孔子要么少说，要么干脆不说，表现了对言说内容的慎重选择。

### （四）时机、分寸、音声之慎时机：

时机：《宪问》中孔子不以“时然后言”（到应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轻易许人，表现

出对这一言说品格的高度看重；《季氏》他又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没轮到到他说，却先说，这叫做急躁）”。显然，孔子对发言的时机相当重视。

分寸：“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从劝告朋友的角度，孔子认为要适可而止，以免自取其辱；这实际上也说的是说话要注意分寸。

音声：《述而》讲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曾子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多考虑言辞和声调，就可以避免鄙陋粗野和错误）”（《泰伯》）。不难看出，对于追求“文质彬彬”（内容形式恰到好处）的儒者，“慎言”之道自然也包含发声吐字的言说形式。

### [思考与作业]

写一篇与本专题“慎言”有关的小论文作为课内作业。

## 第六讲 孔子的教育之道（略）

### [教学目的]

通过本专题相关章句的研读，了解孔子以“因材施教”为主的教育观。

### [教学方法]

提问法、讲读法、讨论法

### [教学内容]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于）素。”曰：“礼后（于仁）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文质之辩是孔门师生经常研讨的话题。此章与19-6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和7-8 子曰：“……举一隅（示之而）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也。”相勾联。

5-8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赋：朱熹《集注》云：赋，兵也。古者以田赋出兵，赋者军需给养也，故谓兵为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邑之室、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不知其仁也。”

6-1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王引之《大戴礼记》“君子南面临官。”注云：“仲弓之德，可为卿大夫以临民，……非使为天子诸侯也。”南面：即面向南。古时为尊位。）

5-9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望：比得上。以：连词，就。）

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5-10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学习和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于生于师均如此，教师不能在认识上给学生贴标签。《史记》载孔子言“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又载宰予“利口辩辞。”孔子于《论语》中许宰我于“言语”科，师生又有“三年之孝”之辩。宰我后为诸侯外交家。弟子中能传承孔子学说者，盖曾参、子夏等几人而已，余者在主张上不乏相向之徒。曾参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形而上之道也。）

5-26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其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

（衣裘：古人的“衣”分上衣和下衣，下衣叫“裳”，是类似裙子的服饰。裘：《说文》云：裘，皮衣也。子路的言论体现了他的慷慨好义，不自私，但又只惠及朋友。）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伐：自称其能曰“伐”，即夸耀。施：表白、夸大。劳：事功曰劳，即成绩。颜回注重自身的修养。）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言论体现他要把恩义普施众人，兼济天下。）

（正义：子路重义轻利，不失任恤之道，义者之事也。颜子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诚爱深，圣者之事也。）

6-8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果：果敢

决断。果者能任事。)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子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达：谓通于物理，达者能明理。）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艺：多才艺。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人之才能，由六艺出，故艺即训为才能。）

（孔子列举了三个弟子的长处，其意在：只要用其所长，他们都能从政。孔子不仅因材施教，也主张因材施教。）

6-13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中孔子曾赞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又谓“商也不及”。子夏论交友之道为“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夏曾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子游责其：“门人当洒扫应对则可。”又《荀子·非十二子》云：“正其衣冠，齐其颜色，谦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孔子如是说，可能出于子夏常拘于小道末节而无儒者“任重道远”的弘毅。）

7-8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示之而）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也。”（愤：朱熹《集注》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意。”反同“返”。此章强调在学习上，学者需要主动性，正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和“思”“学”须并用。）

7-11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乎！”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三军：按周代典制规定，天子有六军，大国诸侯有三军。暴虎冯河：朱熹《集注》云：暴虎，徒搏也。冯河，徒涉也。此章子路自恃有勇力，孔子借以教诲其好勇还须有谋略。）

11-18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yàn）。（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孔子学生。辟：便辟，偏执。喭：鲁莽、粗俗。）

11-22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亦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斯：连词，就。子路好勇、果、兼人且不宿诺，如许其“闻斯行诸”则更加轻妄，故孔子退阻之。冉有优柔，为季氏家臣，知其僭越而不加阻之，知其贪婪而不能止之，知其欲侵伐颛臾以自肥而为之说辞，故孔子告之以“闻斯行诸”，意要“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公西华之惑在于未明孔子因材施教之旨。）

11-26 子路、曾皙（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作“平常”解）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何以”即“以何”，动宾结构，做什么。）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年成不好为饥，果蔬均吃不上为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有能力），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指诸侯会盟），端章甫（端指礼服，章甫指礼帽。这里均用作动词），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此处指想法、内容）。 ”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皙所谈的不是事功，而是乐道，与孔子旨趣相同。）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矣。”

曰：“夫子何哂由？”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相），孰能为之大（相）？”

12-1 颜渊问仁，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12-3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讱，读，谨慎义。）。”

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言语谨慎当然不等于仁，但具备仁的人必须是言语谨慎的，正所谓“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史记》载司马牛“多言而躁”。）

6-22 ……（樊迟）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12-22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3-19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13-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章可与 15-36 “当仁不让于师” 相联解，蕴含孔子培养和发挥学生的创造性的教育思想。）

15-39 子曰：“有教无类。”（此章可与“性相近，习相远”及 7-7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 联解，反映了孔子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观念，即全民性和民主性。）

## [研读总结]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从 30 多岁时开始招徒讲学，此后无论是在从政的繁忙岁月里，或是在周游列国的栖栖惶惶中，始终坚持，乐此不疲地从事教育，最终取得了“弟子三千，贤达七十”的教育业绩，并由此形成了一套恢弘的教育思想体系。实践证明，孔子教育思想有很多超越时代藩篱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它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石，而且也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源泉，许多现代教育理论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雏形或发现萌芽。

### 一、“有教无类”，注意教育对象的全体性

孔子认为人具有可教性和可塑性，主张扩大教育对象，使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他从“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的理论前提出发，首先提出“有教无类”（《卫灵公》）的主张。“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只要本人有主动学习的愿望，肯送十条干肉履行师生见面礼，就可招收为弟子。从数量上来看，由于孔子采取这种开放式办学形式，取消了对入学受教的种种限制，一时间弟子“至自远方，莫不受业”（《史记·孔子世家》），大批好学之士拜孔子为师，孔门弟子号称三千。从孔子弟子的实际情况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孔子确实不分差别、广招门徒的事实，如有身为贵族子弟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善于“货殖，亿则屡中”的富人子贡，也有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贫者颜回；有年龄仅比孔子小 9 岁的长者子路，也有少于孔子四五十岁的后生子夏和子游。

“有教无类”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大变革时期

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各诸侯国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中急需大量的各方面人才；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新兴“士”阶层欲通过学习争取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愿望。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的这一主张不可能完全实现，因为社会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使人人都是可以受教育的水平。但从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有教无类”思想确实打破了贵族垄断学校教育的局面，把教育对象的范围扩大到平民，其历史进步性显而易见。孔子不拘夷夏之辨，弟子中不乏异族之人，其中澹台子羽就是楚国人，受教孔子，后执教荆楚，名显诸侯。

以现代教育理论来关照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与当今所提倡的个性化教育有相通之处。教育个性化要求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来教育学生，使每个学生的个性都能够获得积极、主动和健康的发展。也就是说，面向所有学生是个性化教育得以实现的首要前提。每个学生，不管其民族、种族、年龄、性别、家庭状况、经济地位、健康程度如何，都应当受到相当的教育，得到最基本的条件保障，以满足个体的内在学习需要，实现个性发展的权利。孔子本着“教之则善，本无类也”（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这种对人的发展性和可塑性的认识，在教育对象上不限于贵贱、贫富、民族等种类的差别，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来求学的人，力图使他们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去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局面。因此，可以说“有教无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观念。这是孔子个性化教育思想的首要前提。

## 二、“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独特性

任何事物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独特性是个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个性得以确立的表征，也是个体内在自然——天赋凸现和显发的确证。”个性化教育更多着眼于个体独特的内在潜能和资质的唤醒与弘扬。因此，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独特性，是个性化教育的应有之义。孔子没有明确提出因材施教的思想，但他在教育中确实做到了根据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最终使他们各尽所能，获得发展。孔子的这一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宋代理学家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河南程氏遗书》卷19）。“知人”（《颜渊》），即全面深入认识学生的个性特点是孔子因材施教的主要依据。他在教学观察中不仅发现学生在心理发展上有共同处，“性相近”，而且还发现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突出地表现为：

（1）智力差异。孔子依据人的智力发展水平，把人区分为“上智”、“中人”、“下愚”（《阳货》、《雍也》）三类，这种三分法和现代心理学中对智力的“超常”、“中常”、“低常”的划分相似，有一定的合理性。

（2）才能差异。孔子发现学生的才能各有不同，如子路有治军的才能，“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冉有则有理政的才能，“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公西赤则有外交的才能，“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公冶长》）；子贡则有经商的才能，“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

（3）性格差异。孔子对学生性格了如指掌，并能精练地概括出学生的性格特点，如“柴也愚，曾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同上）是对学生缺点的认识；“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是对学生优点的认识。

（4）个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孔子不仅认识到不同学生间的发展差异，而且也认识到同一学生不同发展阶段间也存在着差异。“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个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生理上的发育状况不同，心理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说明孔子对身心发展关系有一定的认识。孔子根据学生的这些差异，提出不同的教育要求，从多方面进行因材施教。其一，在学生的发展方向上，孔子以“志于道，据于德”（《述而》）为统一要求，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不同的发展目标。这可以从孔门弟子的实际走向上明显反映出

来，据《史记·儒林列传》载，“自子L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孔子弟子在社会上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显然是孔子在发展方向上因材施教的结果。其二，孔子根据学生接受能力的不同，在教学内容上提出不同的要求。“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智力超群的学生，要授予广博、高深的知识，诱导其深入钻研，触类旁通；对智力落后的学生，则只能教给浅显、易懂的知识，导其渐次递进，逐步提高。确实，对智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学生在教育内容上应区别对待，这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十分重要的。孔子的这一认识具有重要的教育心理学意义。其三，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孔子也做到了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如根据学生性格的不同倾向性，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做到长善救失，“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根据学生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提出不同的教育要求。对于青春少年，“戒之在色”；对于血气方刚的壮年，“戒之在斗”；对于垂暮老人，“戒之在得”。我们知道，孔子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长的弟子与最小的弟子相差将近50岁。因此，孔子的这一认识很可能就是他在面对年龄相距如此悬殊的弟子施教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内在规律性。人的个性差异性，决定了教育方法必然要因材施教。“正是看到和承认人的差异性，孔子才有了“因材施教”的做法。在教学中，对人差异性的体认，体现了孔子对人的关照和对个体人的尊重。”如果说“有教无类”是孔子个性化教育思想的首要前提，那么，“因材施教”则是孔子实施个性化教育的基本途径。

### 三、“为仁由己”。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个性的本质特征之一。一个人只有作为主体独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意识和活动，才有可能具有个性的人。个性化教育应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自觉、积极、主动的学习活动中发展起自己良好的个性品质。因此，弘扬主体性是个性教育的必然要求。孔子思想中明显地呈现出人的主体性理念。在《颜渊》中，孔子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就是说，抑制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所以实践仁德，全凭自己，难道还能靠别人吗？言下之意，教育在于透过“自我转化”以达到“世界的转化”，在于以人为主体去改造世界，建立个人与社会的连续性。在教育中，孔子是如何建立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呢？

#### 1. 把主动求学作为招收弟子的首要条件

孔子招收弟子时，首要的条件是看他是否有主动求学的愿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述而》），对于“束脩”，通常的解释是学生初次拜见教师时所执的见面礼。学生主动拿着一定的礼物拜谒教师请为弟子，一方面表示对教师的尊敬，一方面也显示出弟子求学的诚挚与热情。学生在入学之初就抱有积极上进的学习态度，这在以后学习中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 要求弟子在学习中目标明确，满怀信心，持之以恒“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子罕》），这句话透露出孔子对意志价值的基本思想。人的意志犹如三军的统帅，它主宰、支配着人的一切心理与行为。孔子要求学生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树立崇高的奋斗理想，“志于道”（《述而》），“志于仁”（《里仁》），而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鼓励学生对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充满信心，坚信奋斗目标的正确性与可靠性，“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而认为“力不足”（《雍也》）是画地为牢、缺乏信心的表现；劝勉学生以持之以恒的毅力坚持学习，“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述而》），而认为没有恒心的人最终会一事无成，“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子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心理素质，其中，意

志品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孔子教导学生在学习中要下定决心，满怀信心，持之以恒，明显地表示出他对学生主体性的尊重。

3. 坚持以学为本，开始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已经悟到教学其实是师生合作共同完成学生学的任务的过程。因此，教学应以学生的学习为本，教师充当的角色主要是学习的点拨者。”孔子的学本思想是建立在学习可以促进人的发展这一教育信念的基础上。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这里，孔子虽然为“生知”留有地盘，但显然是“虚悬一格”，因为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历史上，他从没有指出谁是“生知”；他所强调的是“学”，一个人能否发展最终取决于自己“学”与“不学”，发展的程度则取决于自己在学习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好学、乐学，遭遇困难而后才知学，身处困厄而仍不知学，人在发展中呈现出的“上智”、“中人”、“下愚”之别，就是由于其在学习主体性得到不同发挥的结果。这是孔子学本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教学中，学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孔子对教学内容的传授上。

我们知道，诗、书、礼、乐是孔子教授弟子的主要教材，但他在教学中并不是逐章逐句地讲解，以自己的讲授代替学生的学习。通过对《论语》的分析，我们发现，孔子多数时候是向学生概述各书的精髓之点，或强调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重视学生的自学。如对于《诗》，孔子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不学《诗》，无以言”（《季氏》）。或者是解答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通过释疑解惑，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作为学生学习促进者和点拨者的作用。“樊迟问知”、“赤也惑，敢问”、“仲弓问仁”、“司马牛问君子”、“颜渊问为邦”等等这些学生问疑之处，在《论语》中比比皆是。孔子通过各种形式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能够以自主、能动的积极态度投入学习。这为其个性化教育思想的落实提供了可靠的内在保障。

#### 四、“和而不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主体性是个性的核心，创造性则是基于主体性的个性的又一内在规定性。”…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无论是缺乏独立性、自主性，还是缺乏创造性，都会被视为缺乏个性。教育的个性化离不开创造性的培养。孔子在总结其先辈认识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的思想，蕴涵着在教学中发挥学生创造性的深刻含义，成为他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想认识基础。其具体做法是：

##### 1. 注意营造宽松的教学环境

孔子一向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教学中充满了民主的气氛。如在“四子”侍坐言志一章中，孔子一开始就向学生说明：“虽然我的年龄比你们稍长一些，但你们不要拘束。往常你们常说‘没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们，你们打算干什么？”这里，孔子不以长者自居，打消了学生因惧怕孔子的威严而不敢畅所欲言的顾虑。当有的学生因为担心自己的想法与他人不同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孔子就鼓励他：“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先进》）。在师生关系上，孔子出于“爱之”、“忠焉”（《宪问》）的教育情感，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的人道精神，与弟子建立了亲如父子的融洽关系。正是这种民主的氛围和融洽的关系，给学生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心理环境支持。

##### 2. 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

善于提出新颖的见解是富有创造性的表现。孔子经常勉励学生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在教师或其他权威面前也不必谦让，所谓“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体现出一种在知识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可贵精神。相反，他特别反对那些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独

立见解的人。如弟子颜回虽被孔子称为“好学”（《雍也》），但颜回缺乏独立思考，对孔子的话言听计从，因而受到孔子的委婉批评，“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

### 3. 培养学生学思相结合的学习能力

创造性的培养离不开思维能力的训练。在教学中，孔子教育学生在注重感知经验学习的基础上，要注意思考，做到感知与思维的统一。原因是“如果偏重感知而不去思维，那么，感知所得虽多，也必然是茫然若失，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反之，如果偏重思考而不去感知，那么，思考得虽然勤奋认真，其结果也必然是疑难重重，问题得不到解决”。

4. 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孔子尤其强调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多问几个为什么。为此，他在教学中创造性地采用了启发诱导的方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将教学建立在学生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孔子的启发教学收到了良好效果，因而得到学生的赞叹和景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罕》）。可见，孔子以“和而不同”为思想基础，营造宽松的教學环境，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着力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这表明孔子已注意与重视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总之，从“有教无类”的前提出发，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通过“为仁由己”，发挥学生的内在能动性，最终实现“和而不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孔子个性化教育思想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和体系。诚然，孔子思想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条件下的产物，与现代个性化教育思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孔子思想具有很大的经验性和模糊性。批阅《论语》，不难发现，孔子多数时并没有明确地阐明自己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他只是以一个教育家的高尚情怀和教育改革家的时代意识，通过孜孜不倦的探索与体悟，将自己的思想表现于日常平凡的实践中。正因如此，孔子思想同时又具有包融性和真理性的特点。在 1 万余字的《论语》中，通过缜密的解读，研究者定会发现孔子思想对于现代教育思想的宝贵价值。可以说，孔子思想中蕴涵有现代个性化教育思想的萌芽，是现代个性化教育思想的滥觞。它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 [思考与作业]

写一篇与本专题“因材施教”有关的小论文作为学习总结。

## 附： 孔子的为师之道

本章教学目标和要求：

- 1、结合师范教育专业的实际，了解儒家经典《论语》中有关教育思想的章句；
- 2、总结《论语》教学思想章句，形成结构认识；
- 3、通过教学了解，加深对古代教育智慧的认识，丰富学生的教学教育知识。
- 4、本专题需要 4 学时。教学内容与课件相结合进行。

教学内容：

## 一、从成为最好的学生开始

孔子被后代尊为至圣先师，其实他自己就是最好的学生。一个人只有先做个好学生，将来才有可能成为好老师。孔子十五岁时就没有机会上学了，于是自己四处找老师，到很多拜访有名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记录就是问礼于老子。老子当时在周朝担任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国家档案图书馆的负责人，因此老子对古代学问和历史发展，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此段故事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孔子除了问礼于老子，还跟随师襄学音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师襄是一位盲人乐师，孔子向他学习演奏乐曲，每当孔子很完美地演奏一首曲子时，师襄都会主动赞美孔子，说：“你弹得很好了，现在可以换另一首曲子。”孔子却说：“不行，我只会弹这首曲子的旋律，还没有掌握到它的技巧。”师襄一听，也有道理，就让他继续弹奏。结果同一首曲子，孔子练习了好几天，技巧已经纯熟到可以表演了。

师襄又说：“换一首曲子吧，我教你别的。”孔子还是说：“不行，我只知道它的技巧，还不知道作这首曲子的真正用意。”于是老师只好让他继续练习。又过了好一阵子，孔子主动说：“现在我知道这首曲子的心意了，但是还不够深入，还不知道这首曲子里所描述的人长什么样子。”他先后做到“习其曲，习其术，习其志”，最后还要“得其为人”。

就这样，同一首曲子孔子不断地弹，直到有一天，孔子说：“我终于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这个人长得瘦瘦的，高高的，黑黑的，眼睛望的很远，好像正在牧一群羊。”这个人除了是周文王，还会是谁呢？师襄惊奇地回答说：“这首曲子就叫‘文王操’，正是歌颂周文王的。”师襄此时离开自己的座位，向孔子鞠躬，认为眼前这个学生值得敬畏。从这里可以发现，孔子学什么都完全投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掌握古代的知识和技能，并且不断温故知新，后来自己也当起老师。

### 学习贵在真实的内涵

《论语》开头三句话，就涵盖了人生的三个阶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一，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要在适当的时机加以实践；第二，有了心得，可以和朋友交换意见、互相请益；第三，修养有成就之后，如果别人不了解我，也不要生气。学而时习之的“时”，并不是时常，而是指适当的时候，也就是时机。《孟子·万章下》推崇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该清高是就清高，该随和时就随和，该有责任感时就有责任感，这是需要大智慧的；大智慧，就是我们通过学习之后希望能够蕴发出来的。所以学习之后，要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印证练习，才有一种成长的快乐。

孔子的学习，具体来看具有三个特色：

第一，学习五经六艺这些传统。对于传统，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毕竟已经存在了，也就没有人可离开传统。只有理解了传统之后，才能使旧传统转化出新的力量，在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所以首先就是要把传统的知识和能力学好。

第二，要设法将学习和思考配合。学习和思考要同时注意，光是学习而不思考，学不到半天就忘记了，也就无法真正去实践；不如打开书本，好好学习古人的智慧，翻开书本就可以受益。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人生的事情如果全部都靠自己经验的话，哪里来得及呢？唯有学习和思考配合，才有一种主观的觉悟。也只有在了解了以后，才愿意去实践，所以通过学和思，可以使古人的生活智慧和现代的生活处境重新结合。

第三，要经由反省来改变自己的行为。鲁哀公曾问孔子，在他的弟子当中孰为好学，孔子回答说只有颜渊，而且还特别加了一句话，说颜渊：“不迁怒，不贰过。”（《雍也》）好学是“知”，不迁怒和不贰过是“行”，两者一定要配合。

### 因材施教，用心良苦

孔子作为一个老师的风范，是“学不厌，教不倦”。能够学不厌，教不倦，本身就是最好的学生，也是最好的老师。活到老，学到老，完全实践在孔子身上，而他的学习室很广泛的。例如他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别人身上一定有可以让自己效法之处。看到别人的优点就向他学习，看到别人的缺点就提醒自己不要向他一样，这也就是“见贤思其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实践（《里仁》）。

谈到孔子教学的特色，第一点是“因材施教”。孔子有很多学生，有两个学生在政治方面颇有成就。其中一位是子路，个性直率，非常刚健进取；另一个学生是冉有，他比较内向，很多事情都要一想再想，时常畏缩不前。《先进》里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意思是说：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老师，听到该做的事，是否就该立刻去做？”孔子说：“不行，有父兄在，听到该做的事就不能立刻去做，而是要先考虑父亲和哥哥是不是同意。”后来冉有也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对，立刻就做。”这时有个学生公西华正好在旁边，就问孔子说：“两位同学问老师同样的问题，老师的答案却正好相反，这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冉有的个性较为退缩，所以要他进取些；子路的个性争强好胜，凡事都想胜过别人，所以才会要他‘退之’。”这就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具体例子。

孔子的学生来自于各个地方，每个人的成长背景、生活状况，难免有所差异，当然也有不同的性格特质。《先进》里提到四个学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第一位是高柴，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学生，母亲过世后，史书上记载他哭得眼睛都流血了。孔子说这样是愚笨的行为，孝顺固然好，但是仍然得保重身体；任何情感都要“发而皆中节”，如果因为哀痛，伤心过度而伤了身体，反而是不孝的行为，孔子在这里提醒学生，不要忘了顾及生命的其他方面。

第二位是曾参，年纪很轻就跟随孔子学习，人比较老实，所以说他很愚钝。表面上看来似乎比较容易吃亏，但事实上，愈老实的学生，往往反而更认真地把老师教的全部学会。果然，后来传《大学》传《孝经》的，都是曾参一人。

第三个是子张，在《论语》里面他最年轻。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他虽然年轻，志气却甚高。根据史书记载子张不只功课好，反应快，外表更长得高大又帅气，同学们对他却好像不是很满意，人缘似乎也比较差。孔子就认为子张太过高傲了。

第四个是子路，是位勇士，“彘”就是粗野。子路是个粗线条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比较大而化之，做事手段也比较粗糙，不过有他可爱的地方。这里多说几句。

先说孔子收子路为学生的一则趣闻。有一天孔子走在曲阜街头，看到一个年轻人，头上插着斑斓的公鸡毛、身上披着野猪皮，还带着一把剑，好像随时都可以与人打架决斗，此人就是子路。孔子主动对他说：“你看起来还蛮直率的，何不来跟随我学习呢？”子路说：“何必学习呢？南山有竹，资质非常好，看下来当箭可以射穿犀牛皮。”子路认为自己就像南山的优质竹子，资质天生，根本不用学习。子路也不过比孔子小九岁而已，当场就让孔子碰了一鼻子灰。孔子却对他说：“如果你把南山的竹子前面削尖，再装上箭头，后面插上羽毛，不就可以射得更深了吗？”子路听了，于是立刻拜孔子为师，请求孔子收他为弟子。此段故事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

孔子到处讲学，很多时候都觉得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帮助百姓。有一天，孔子忍不住感叹，说他曾经两度想“移民”国外。

有一次孔子就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意思是：因为理想不能实现，干脆做个木筏流浪到海外算了。会跟我去的，大概就是子路了吧？

子路听到老师要出国，而且只选他一人跟随，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喜形于色。他过于高兴，以至于其他同学都嫉妒了起来，孔子又立即提醒他：“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意思是：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找不到地方取得适用的木材。

这段话很有意思，前面先以木筏做比喻，后面又说找不到适用的木材来渡海，因为普通的木材是无法渡过大海的。孔子以这样的比喻做训诫，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很有幽默感的。

这四个学生，孔子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描写了他们的性格。老师知道学生性格上的缺点，也正是教育他们的开始。所以像孔子这样的老师，教导学生的态度，是先深刻了解学生的需求和他们性格的特质，再给予明确的指导。

### 适才适性，造就英才

有的学生像子张，理想很高，叫做“过”，子夏比较保守，叫做“不及”。学生拿子张和子夏来比较，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过度和不够都不好。因为过可能会矫枉过正；不及可能会退缩保守；过与不及都不够理想，最好是中庸之道。所以孔子教学的时候，皆按照学生各自的条件、人格特质，而设法提出指导。

颜渊认为老师的教学方法“循循善诱”，就是慢慢来，一步步地教导。他又说跟随老师这么就我，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博代表广博。意思是：用文化、

文学、文艺来增广我的见识，用礼来规范我的做人处事。

孔子发现颜渊这个学生很好，曾对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意思是：有人要聘用我们，就出来做官；没有人聘用为我们时，就把自己隐藏起来，这只有我和颜渊做得到而已。这时候子路在旁边，听了当然心里很不舒服，立刻上前说：“老师，如果让你统率三军打战，你要带谁去？”孔子说：“想空手打老虎，徒步就要过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才不跟他一起去呢。”接着孔子又说：“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意思是：一定要遇到任何事情都谨慎谋划，谋定而后动，把事情做成的人。因为人生不能重来，凡事更不能鲁莽、任性。这是孔子对子路的当头棒喝。

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第一科德行，第二科言语，第三科政事，第三科文学。在德行科里，颜渊第一，闵子骞第二，冉伯牛第三，仲弓第四。其中以闵子骞的孝顺最是家喻户晓。他父亲再娶，后母生了两个弟弟。有一天后母叫他拉车，在寒冬里，给他穿的棉袍里包的却是芦花。天寒地冻，衣薄拉不动车子，父亲生气了，就挥鞭打他。这一打，棉袍破了，露出了芦花，父亲这时得知真相，气得要把后母休掉，闵子骞却请求父亲打消此意，因为：“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闵子骞作为孝顺的代表，没有话说。

言语科以宰予、子贡两人最有名。《述而》里记载一段故事。孔子是鲁国人，周游到了卫国，卫国刚好发生内乱，国君父子相争，很是不堪。孔子颇受卫君辄的崇敬，因此有不少学生怀疑老师会不会出来做官，“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有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贡代表同学去问孔子。走进教室，他并没有直接问，而是对孔子说：“老师觉得古代的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怎么样？”这两人为了坚持原则，最后都饿死在首阳山上。孔子回答：“为了坚持原则，求仁而得仁，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子贡听了，知道老师是有原则的，就走出了对同学说：“老师不会帮卫国的国君做事的。”

子贡真是聪明，不直接问老师要不要做官，而是转了个弯，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再探看老师的态度，这就是口才一流又十分聪明的子贡。

有一次，子贡见老师总是提到在众弟子中最欣赏颜渊，心里不爽滋味。孔子知道子贡内心的意思，就问：“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意思是：颜渊闻一知十，我闻一只知二。这当然是很谦虚的比喻，就知道口才的表达，言语的微妙，在子贡身上表现得可说是淋漓尽致了。

至于宰我的口才，则一方面他能让孔子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亦即“听其言而信其行”（《公冶长》），另一方面他所提的“三年之丧”的问题，使孔子说出一番有关人性论的大道理（《阳货》）。

## 教育的整体性

现代很多人强调除了智力智商之外，还有情绪智商，以及逆境智商，认为个人情绪的管理与调和以及碰到困境是该怎么处理更重要。这三种智商都同时被强调。事实上，孔子在当时就已经提出全人教育的理想。所谓“全人教育”，就是指五育均衡，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都要注意。

全人教育的理想，就是成就一个完整的人。第一是人才教育，第二是人格教

育，第三是人文教育。人才、人格、人文，三者合起来叫做全人。

第一是人才教育。所谓的人才就是“用之于外”，可以让自己自力更生。教育首先要培养人才，这样社会才能够永续发展，愈来愈繁荣。

第二是人格教育。人格教育的特色是“求之于内”，是一种自我要求，自己愿意这样做。从被动变成主动，才有道德的尊严。

第三是人文教育。要了解孔子的人文教育，要从他对诗和乐的认识开始。他在《阳货》里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这四个字都和情感有关。

兴，就是把真诚的情感引发出来。《诗经》本身是真诚情感的表达。孔子在《为政》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月思无邪。”意思是：《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情世故懂多了，逐渐习惯将真诚的情感压抑下来，时间一久，往往就会忘记什么事真诚的情感。读了《诗经》之后，发现个人的情感这么真诚，长久压抑在自己内心的情感自然也被引发。“观”就是真实地了解自己，观察自己的志节。“群”是跟别人比自己好的部分，所以抱怨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读了《诗经》以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已经比别人幸运多了。

孔子教学生的时候，“诗”跟“乐”是不能忽略的，常常读《诗经》情感就会很真诚。“乐”是音乐的“乐”，“乐”让生命产生一种和谐愉快。孔子很喜欢唱歌，也很喜欢演奏。前者是表达自己的感情，后者是把古代的乐曲表现出来，也可以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两者的作用不太一样。

在《论语》里可以看到孔子的生活，充满审美的情操。他一个人在家没事就弹弹琴，唱唱歌。《述而》里有一句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今天如果哭过，就不再唱歌。还有一句话：“子与人称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意思是孔子和别人唱歌唱得快乐，一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然后他再同别人唱和声。由此可以想象孔子唱歌唱得多么开心。因此，他平常的生活“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正是很自在轻松的模样。春秋时代天下大乱，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孔子每天照样安顿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从不杞人忧天。

教学的最高艺术

孔子教学生的方法很多，《孟子·告子下》曾经提到一种教学方法是“以不教为教”。就字面来解释，也就是我不教就是在教你。在《阳货》里，孔子就示范了这种另类的教学方法：“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的学生孺悲想拜见孔子，但孔子不想见他，于是推脱身体不适。负责传话的人刚踏出房门，孔子就立刻取下瑟来弹奏歌唱，故意要让孺悲听到。孔子就是要让他知道，自己犯的错，自己要懂得去改，知错就改，不就没事了？这样的不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许多人提到孔子喜欢启发式教学，因为“启发”两个字确实来自《论语》，《述而》里说：“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愤，不启”，是指要到学生想懂而懂不了，我才去开导他。如果学生不用心，什么都没准备，即使老师想开导也开导不了。“不悱，不发”，是指不到想说而说不出来，急得脸都涨红了，老师是不会给学生引发的。所以启发式有条件的。

孔子也有不教的学生。第一种是太不用功的，另外一种是想巴结孔子。孔子曾说：“经过门前，不进来跟我讨论，我也不觉得遗憾的，就是乡愿。”乡愿就是不真诚，一个人不真诚，孔子也毫无办法。儒家对于真诚的要求是绝不让步的。原文出于《孟子·尽心下》：“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

至于孟子，他也有一种学生不教，那就是自暴自弃者，认为自己不行，不能长进的人。一个人甘愿自暴自弃的话，谁又能帮忙呢？这一段说明，儒家作为教育的重要学派，一定要学生自己愿意学，学习的动力要由内而发。孔子只能分享他的经验，来说明学习之后是多么美好的情况。

孔子自己与学生的共同目标是成为“君子”，指的正是人格完美的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彬彬”的本义，就是黑白搭配分明，亦即言行要调节得适当。孔子说人的生命，原始的力量，叫做淳朴的本质。淳朴的本质，可能很直爽，也可能比较粗糙，因此要受文化的熏陶。与别人来往，要用礼用乐，人如果不能文雅礼让，那与其他动物又有什么差别呢？这种文质彬彬的君子，不是只为自己，同时也希望为天下人服务。

曾参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是他的想法。他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对他的评语是“参也鲁”，意思是曾子的反应向来比一般人慢了一点。所以，如果把曾参说的话，当做是标准答案的话，对孔子来说，恐怕不见得公平，不是孔子内心真正的意思。

如果曾参所说的是标准答案，那么孔子也不会慨叹“莫我知也夫”（没有人了解我啊）（《宪问》）。作为一位老师，孔子有教无类，并且因材施教，但是奈何学生的年纪与经验未必可以真正了解孔子最深刻的思想。孔子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自己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由此塑造了儒家的求知特色，我们在学习孔子思想时，不可忽略他对全人教育的理想。

## 第七讲 孔子的贫富观（略）

### 本章教学目标和要求：

- 1、结合师范教育专业的实际，了解儒家经典《论语》中有关贫富观的章句；
- 2、总结《论语》相关章句的思想，形成对《论语》的结构认识；
- 3、通过教学了解，加深对古代儒家价值观的认识，丰富学生的人生观认识。
- 4、本专题需要4学时。教学内容与课件相结合进行。

### 教学内容：

### 金钱的正面价值

儒家思想是入世的，主张将个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的繁荣发展结合在一起。孔子周游列国时，曾经碰到几位隐居的人，他们认为世界太乱，不如明哲保身，自己找个僻静的地方耕田，自食其力，不去管这个混乱的天下。孔子就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意思是：“人不能与鸟兽一起生活，如果人不与人类在一起，要与谁在一起呢？这是儒家思想的入世性格，认为每个人都要在家庭、社会里才有可能成长，因此儒家是从正面看待社会的。

《子路》里记载：孔子前往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这里人口众多啊！”冉有说：“人口众多之后，接着应该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说：“如果已经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孔子说：“教育他们。”这里提到三点：庶之、富之、教之。第一是肯定人口众多。由此可见，儒家肯定生命的价值，反对自杀或杀人。第二，人口多了之后，就让人们发财；有钱不是坏事，有钱可以使人自由。黑格尔（Hegel,1770—1831）说：“人的自由来自于私有财产。”比如你要在一天之内从南方到北方，可以乘飞机、搭火车，也可以坐汽车；但如果没有钱，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人的“自由”，需要以金钱作为基础，但金钱不是万能的，我们不应该以它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它只是中间的阶段，亦即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所谓“必要条件”，就是：非有它不可，但有它还不够。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孔子过世以后，弟子舍不得离开老师，就为他守丧三年，然后才各自回家，继续进行自己的生活与事业。只有子贡又回到老师的墓前，盖了一间房子，再守一个三年之丧，这除了对孔子的敬爱之心非常

深刻外，他还需要有些金钱维持生活，才能连续守在坟旁五十个月。

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中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时很穷，后来做生意发了财，一生中经历了贫困与富裕。孔子曾说子贡这个学生，没有得到官府的允许，就自己做生意。春秋时代社会已经开始乱了，很多事没人管，纵使没有特许，也可以私下做一点生意，子贡就是这样积累财富的（《先进》）。结果，他生意做得好，发了财；有了钱，他才有能力再多为孔子守丧三年。所以赚钱不是坏事，只要赚来的钱是正当的即可。

第三是要“教之”，就是要让人们受教育。好的教育让人拥有正确的人生观，知道人生的目的何在。以上就是人家的人生观：人口众多，大家发财，接受好的教育。这里把“教育”列为第三，并不是认为教育不太重要，却反而是强调：教育是人类活着及有钱之后的“目的”所在。若不是为了受教育，则人们光是活着又有享受，就可能沦为孟子所说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

## 对财富要有正确认识

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在思考人生问题时对于财富都有一些基本的态度。以希腊人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 469—前 399）为例，他对有钱人提出两点看法。第一，是否用正当手段挣到钱。如果是，当然要尊重，因为赚钱需要能力、努力、聪明加上运气，再加上许多其他外在条件，所以只要赚钱的手段是正当的，就值得我们尊重。第二，观察他赚钱后对金钱的态度。有一种人是“守财奴”，有钱之后，变成金钱的奴隶，这样又怎么获得别人的尊重？另一种是“金钱的主人”，利用赚到的钱来行善，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苏格拉底认为，手段正当和善用金钱这两点，是我们判断有钱人的重要原则。

关于财富有三点要考虑。第一是财富的“命定性”。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命和天是很难掌握的，冥冥之中好像有天意在安排一切。有些人天生好命，口含金钥匙出生，要什么有什么；有些人命苦，生下来什么都没有，孔子就属于这一种。后来他很有成就，别人称赞他，就问子贡：“你们老师怎么有这么多才干呢？”子贡口才非常好，顺着这个话就说：“上天让我们老师

成为圣人，同时使他有许多的才干。”意谓孔子是上天特别选定的人。后来孔子听到这段对话，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意思是：我小时候的家境清寒，出身卑微，任何琐碎的事情都要学，什么粗重的事都会做。原来别人称赞他多才多艺，都是源自于从小家里贫困，没有帮佣、小厮啊。世间没有人喜欢贫困，但是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并非自己所能选择，因为时也，命也，运也，所以不必把富贵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

第二是财富的“合法性”。如果认定人生的目的是赚钱，很可能会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引用阳虎的话：“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财富往往来自不仁德的手段；反之，要行善做好事，就很难发财。

第三是财富的“终结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说：“有钱人就好像一头驴子，背着沉重的金币走完一生。”没有钱的人身上反而较为轻松。儒家则认为，只要用正当的手段赚钱，也可以为社会做许多好事。

因此，对于财富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解。一个社会应该设立公平竞争的机制，只要通过这个合理的机制，能者得之。如果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帮助别人、照顾百姓；这样的能者，愈有钱，愈有地位，对社会愈好。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述而》）意思是：如果财富是可以追求得到的话，就是让做市场的守门人我也干。但是如果必须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行不义而得到富贵，那么它对我就如天上的浮云，这时我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全力修德吧。可见儒家思想基本上认为只要手段正当，可以尽量发财；只是发财之后，要记得用财富来行善，回馈社会。

## 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遭遇贫贱时又该如何呢？孔子曾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子贡也曾请教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学而》）意思是：贫困而不去谄媚别人，富有而不流于骄傲，老师认为这样的人怎样？这两句话正好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孔子的回应是：“这样可以了，不过还不够，还可以更好。”意思是修养还不够，离君子的理想还有一段距离。人

最怕原地打转，所以有了这种表现还要继续进步，提升自己的层次，让自己的生命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孔子接着对子贡说：不错了，但还是不够，因为还比不上“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八个字，就是孔子对于贫困最基本的观念。

古代若要遵守礼仪，是很耗费金钱的，因为礼仪必须展示排场，合乎一种必要的规格。有钱人好礼的话，言行中规中矩。“富而好礼”，显然不及容易做到；但是“贫而乐道”，处在贫困中而依然快乐学道，就很困难了。孔子认为学生之中只有颜渊可以“贫而乐道”，《雍也》里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三句话说明了颜渊非常贫困，一般人都受不了这种贫困的忧愁，但是“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却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快乐。这就显示出生命的不同内涵，因为颜渊有他独特的价值观。《庄子·让王》提到孔子劝颜渊做官，因为颜渊德行好、知识渊博，又好学，最有资格做官，连子贡都不禁赞叹“颜渊闻一知十，我闻一知二”（《公冶长》）。但是颜渊不做官，他以老师的道为乐，“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

## 乐于道义，谋道不谋食

孔子的道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让人看了？学习儒家精神要把这个秘密找出来。

一般人只知孔子多次称赞颜渊，知道颜渊虽贫困但很快乐，却疏忽了孔子自己也很贫困。孔子描述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意思是：吃一点简单的饭菜，喝一点白开水，手臂弯起来做枕头就睡了，快乐就在其中呀。

儒家快乐的涵义是什么？简言之，儒家思想掌握到人性的真相。一般人往往只看外在的作为与遭遇，人的得意或失意，儒家却能看到人的真实内在。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在引发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十分关键。活在世界上就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让自己去做该做的事。因为是由内而发的，所以快乐也是由内而来的。也就是说，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就会对自己满意。至于别人是否了解我的动机、是否对我行为的结果表示满意，我并不在意。做自己该做的事，该做的事就是善，而善就是自己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儒家最重要的贡献是，对于善有清楚的界定。《孟子·尽心上》提及四种善：孝、悌、忠、信。这四种善有其共同的结构，“孝”是与父母的关系，“悌”是与兄弟姊妹的关系，“忠”是与上级的关系，“信”是与朋友的关系。以上四者，都是自己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换言之，善恶的概念不能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善就是“适当关系”，与人相处，关系适当就是善。

## 以适当方式实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紧接着要问的是：如何判断“适当”二字？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三点。

第一，内心的感受要真诚；第二，对方的期许要沟通；第三，社会的规范要遵守。首先，真诚就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对人有几分感情说几分话，既不隐瞒，也不夸张。孔子曾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意思是：把怨恨藏起来，而假装友善与别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孔丘也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耻。换言之，交朋友要坦诚。朋友之间共处共事，不免会产生误解的情况，这时最好坦白沟通，使误会自然化解。所以，与人相处，内心的真诚是第一步。第二，对方的期许要沟通。在与别人交往时，当然要知道别人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如果不管这一点，而一意孤行，自以为是，双方就很难交往下去。若要做到孝悌忠信，一定要考虑到相关之人对自己的期许，但也不必去讨好每一个人。刻意讨好每一个人，就接近乡愿，成为孔子最讨厌的人了。所以，交友要衡量自己的能力，要约束自己，减少交往的复杂性；与别人来往愈单纯，就愈能以诚恳的态度去面对。第三，从留意到内心的真诚感受，到沟通对方的期许，接着要考虑的是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的共识，包括礼仪、法律、公序良俗等。一个行为要想符合“善”的要求，自然不可破坏这些规范。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意在于此。将以上三点合起来思考，就知道该如何选择适当的方式，来实现人我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善”。问题在于这三点如果相互之间无法协调，又该怎么办？答案则是：要以真诚为最后考量。

此外，儒家谈善的时候也强调“变通”，通权达变。权就是权衡、度量，权衡缓急轻重才可采取变通的做法。《孟子·离娄上》有一段著名的权变故事。我

们知道古人十分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于是有人就故意问孟子：“如果嫂嫂掉到水里快淹死了，我能不能伸手拉她？”孟子说：“嫂嫂掉到水里不救的人是豺狼，太狠心了。”因为这时候不出手相救，可是要出人命的，这是特殊情况，要知权变。

人生有平常的情况，也有特殊的情况，儒家能守经达变，最主要是看存心正不正。儒家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并且教人如何判断是否适当。首先是从真诚开始，在把握真诚时，会发现自己与别人多少会有认知上的落差，这时就需要沟通，沟通时再以社会规范为标准，这样错误自然就会减少，“道”也就可以实践了。颜渊就是了解孔子的“道”，并且不断加以实践，因而觉得快乐由内而发，有如得到源头活水。

## 德行比财富更重要

《论语》里有一段话听起来很简单，解释起来却不容易。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大意是：富与贵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如果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得到的，我就不要。后面一段就难了：“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即贫与贱是每个人所讨厌的，如果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加在我身上，我也不去避开。为什么不该得的富贵要避开，而不该得的贫贱却安然接受呢？譬如柳下惠非常杰出，却没有受到重用，那么他为什么不想尽办法避开贫贱的处境呢？孔子自己也处在类似的状况啊！由此可以看出儒家认为人在贫贱中，更容易掌握到人生的正确途径，因为在贫贱中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能够更专心于修德。这正是了解儒家的关键。

没有人喜欢贫贱，但是不巧因为时也，命也，运也，而遭逢贫贱的窘境，这时不必逃避或怨天尤人。这样才能学习颜渊、孔子，在贫贱中专注于实践“择善固执”的思想，由此体验人生的真正乐趣。一棵树要长得高，根一定要扎得深，扎得深是既辛苦又痛苦的，因为地底下又湿又暗；然而扎根愈深，将来才可长成愈高大的树木。赚钱发财偶有侥幸，但是人的德行一定是在艰苦修炼中慢慢成长的。

儒家期望每一个人能够明白“道”：从“人性向善”到“择善固执”，再向往

“止于至善”的境界。要把天生的禀赋发挥出来，用个人的力量来帮助别人。不但要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还要努力实践“己欲立而立余人，己欲达而达于人”（《雍也》）。在孔子的想法里，有能力有办法、又富又贵的人，都应该帮助弱者，如此天下就走向太平了。所以儒家的理想能够实践的话，人们就不会把赚钱当成生命的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了，因为人生是要在价值的阶梯上不断向上提升的。

我学习儒家几十年，发现孔子与世界各大哲学家并列毫不逊色。当代德国的一位哲学家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是存在主义的重要人物，他写下一大套介绍历代哲学家的书，最后选出了“四大圣哲”，按照年代先后分别是：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人呢？从世俗的眼光看来，这四人并不是所谓的成功者：释迦牟尼本来出身贵族，是小国的王子，后来放弃了王子身份，过着像乞丐般的出家生活；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受人嘲笑，有如丧家之犬；苏格拉底最后被判死刑；耶稣三十三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们的伟大，这就证明了生命的价值“在内不在外”。人格的尊严既不是世间成就可以增加的，也不是各种患难与不幸所能减少的，连死亡对他们也莫可奈何。他们四人给所有的人带来生命中最深刻的信心与希望。

关于开展的贫富观，孔子最后提醒我们：“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能够身处富贵而不傲慢，比较容易做到；能够身处贫贱而毫无怨恨，甚至喜悦自得，才难以做到，也才是真正的伟大。孔子能够名列世界四大圣哲之一，可谓当之无愧。

## 附： 关于“春秋笔法”

### [教学目的]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了解孔子以“春秋笔法”与孔子、《春秋》的关系以及学界对“春秋笔法”的一些共识，作为对《论语》学习的深化。

### [教学方法]

提问法、讲读法、讨论法

### [教学内容]

## 一、《春秋》

### (一) 关于《春秋》的名称

关于《春秋》的名称，有四种说法：(1) 春作秋成说。《公羊传》徐彦疏引《春秋说》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

(2) “法阴阳之中”说。《公羊传》疏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贾逵服虔主之。(3) 错举四时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4) 古恒称说。毛奇龄《春秋毛氏传》说：“古谓春以善善，秋为恶恶。《春秋》者善善恶恶之书，则《毛诗》‘春秋匪懈’，《孝经》‘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中庸》‘春秋修其祖庙’，未闻有善恶于其间也，盖古来恒称如是矣。”毛说为是。

这是因为在尧制新历以前，应如《左传·襄公九年》所说“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即观察心宿二以定季节，实行“火历”（用庞朴语）当时应只知道有春秋，不知道有冬夏。所以当时的人习称一年为一个春秋。自尧制定新历，始知道“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知道一年有四时春夏秋冬。《尚书·洪范》说“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说明尧时制历是“立象日月星辰”而不是只观察星宿，所以知道一年有四时，即有冬有夏。正因为这样，所以《礼记·孔子闲居》说：“天有四时，春夏秋冬。”《庄子·至乐》说：“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尚书大传》说：“七政者谓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三书都称四时为春夏秋冬而不称春夏秋冬，可见旧日相沿成俗，短期内不易改变。鲁史记称春秋与《毛诗》的“春秋匪懈”、《中庸》的“春秋修其祖庙”一样，正是“古来恒称如是”。当然《公羊传·隐公六年》说“《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是书虽名为春秋，而仍然按照四时记事。

### (二) 《春秋》一书的本质特点

从《春秋》一书的本质特点来看，它是讲什么的呢？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说：“《春秋》有大义，微言。所谓大义者，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我看这个说法不见得对。《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证明《史记》说“《春秋》以义”，最为可信。

什么是“义”呢？我们认为这就是《中庸》所说之义，即：“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因此《史记·自序》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庄子·天下》说：“《春秋》以道名分。”也是对的。因为“礼义”当然是义。“名分”也是义。因为“义”讲“尊贤之等”与“道名分”一样，说到底都是崇尚等级制度。《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为《春秋》？把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其实，这就是说孔子怨于春秋时天下大乱，想利用旧日的等级制度来恢复社会安宁秩序。今人一提等级制度无不持反对态度。我认为这是把等级制度与阶级制度混为一谈。其实，将来阶级消灭以后，等级可能还要存在。因为人类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从性别来看，有男女；从年龄来看，有老幼；从智力来看，有智愚；从体力来看，有强弱。想要不分等级，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所以我们应该反对阶级制度，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不要一般地反对等级制度。一般地反对等级制度，必然导致平均主义。我们吃过平均主义的苦头。平均主义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

### （三）所谓《春秋》以道义，在《春秋》一书里，有哪些具体表现。

兹简要地举出几条显著的例子。

#### 1. “据鲁、亲周、故殷”。

此条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可惜被何休作了错去的解释，以致为千载诎病。其实《公羊传宣公十六年》说：“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这个“新周”，应读为亲周。古新、亲可通用。而何休不懈此，仍读为新旧的新，以致错误地在《公羊解诂》里，说成“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晋人王接说：“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骇，志通《公羊》，往往还为《公羊》疾病。”是对的。然而主今文的，直至清末，还以何说为是，可见门户之见为害之巨。

《史记》说“故殷”就是故宋。《礼记乐记》“宜歌商”句下郑玄注：“商，宋诗也。”宋可名商，当然亦可名殷。《公羊传襄公九年》说：“（宋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灾也。”《谷梁传庄公十一年》说：“宋大水。外灾不书，此何以书？王者之后也。”又《襄公九年》说：“宋灾，外灾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这说明《春秋》是鲁史，自应根据鲁国的史实来写。周为共主，有的事情，在别国发生，鲁史可以不写，在周发生，就不能不写。因为周与鲁有特殊关系。这种写法在《春秋》里，名为“亲周”。

《礼记郊特牲》说：“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贵贤也。尊贤不过二代。”根据尊贤不过二代的原则，周以杞、宋为二王后，则鲁自应上黜杞而故宋，以宋为王者后，在《春秋》书法上，自应给予特殊表示。孔子作《春秋》首先坚持这样一条原则，这就叫做“《春秋》以义”。

#### 2.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这条原则分别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四年、哀公十四年。很明显，“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说所获得的史料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地，有的是再间接地。因而在写法上不能一样。也就是说史料是近者详，远者略，在写法上也应该详近略远。《荀子非相》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荀子的这种说法实际就是孔子作《春秋》坚持这条原则的真实意义。可是，这条原则却被何休给搞糊涂了。他隐于公元年这条原则之下说：“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志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粗犷，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

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类剽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里这几条原则本来不是难懂的事，而何氏故意求深，不但把三世、内外两条原则牵附一起，而且制造一个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这就不能不越说越使人糊涂了。

### 3.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这条原则见于《公羊传 成公十五年》。原文说：“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也是“以义”，即贯彻执行等级制度的表现。这个道理很容易懂。例如从吉林省对辽宁省来说，则吉林省为内，辽宁省为外。从中国对日本来说，则中国为内，日本为外，不过，何休把它同三世诸说纠缠在一起，就不容易懂了。当然，何氏说由于时代不同，这条原则也会发生变化，则是对的。

### 4.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公羊传 闵公元年》说：“‘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公羊传 庄公四年》说：“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日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今纪无罪，此非怒与？日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则纪侯必诛，必无纪者；纪侯之不诛，至今有纪者，犹无明天子也。古者诸侯必有会聚之事。相朝聘之道，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然则齐纪无说焉，不可以并立于天下。故将去纪侯者，不得不去纪也。有明天子，则襄公将为若行乎？日不得也。不得则襄公曷为为之？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谷梁传成公元年》说：“王师败绩于贸戎。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又《成公九年》说：“晋栾书帅师伐郑。不言战，以郑伯也。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案“公”“谷”二传言讳颇多问题。《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说：“《公羊》《谷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我看这个说法很对。尽管二传散配今文，容或有误，而孔子作《春秋》，原有这条原则是可以肯定的。又啖助说：“讳者非隐其恶，益讳避之，避其名而逊其辞。”这种说法是对的。

余如“常事不书”（见《公羊传桓公八年》），“书其重者”，（见《公羊传庄公十年》），原文说：“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见《谷梁传桓公五年》），原文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之也。”又《庄公七年》说：“夏四月辛卯，恒星不见。恒星者经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不见者，可以见也。夜中星陨如雨。其陨也如雨，是夜中与？《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中之，几也，而日夜中，著焉尔。何用见其中也？失变而录其时，则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陨，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见，而不知其陨也。我见其陨而接于地者，则是雨说，著于上见于下，谓之雨，著于下不见于上谓之陨，岂雨说哉？”等等，亦应是《春秋》以道义之义，在这里就不祥说了。

#### （四）《春秋》与“三传”的关系。

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这个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今知《春秋》全书仅一万六千多字。然而说《春秋》文约义丰，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春秋》没有传注是不容易读通。今传世有“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在汉初，《公羊传》最先立学官，《谷梁传》次之。《左传》在汉哀帝时，刘歆始建议立学官，引起一场争论。即一方面博士不肯置对。认为“《左传》不传《春秋》”。另一方面，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传》《谷梁传》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详略不同”。以后各树朋党，争论长期得不到解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篇首有一段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原文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所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见书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意。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也就是说，《公羊》、《谷梁》二传所记的，主要为“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见书也”，而《左氏》所记的，主要为“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验之各书，昭然可据。三书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须互相攻讦。宋人叶梦得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这个说法是对的。

#### 思考与练习

- 1、用简答题的形式述说本章“春秋笔法”的主要内容。

小结：

## 认识“儒”与儒家

###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总结，让学生了解“儒”和“儒家”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更好地认识春秋时期“士”这一历史概念和“儒”的历史演变。

### [教学方法]

讲授法

### [教学内容]

一、儒，“从人，需声”（《说文解字》）。从字形上看，儒在先秦时是一种人。“儒”字最早见于《论语》“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所以儒作为一个阶层出现不会太早。

在先秦著作中，儒被称作儒士，可见儒是士的一种。如：

①《墨子·非儒下》：“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②晋·葛洪《抱朴子·审举》：“兵兴之世，武贵文寝，俗人视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

“士”是什么人呢？

“士”是中国宗法奴隶制中一个特定的等级，属于“食田者”即贵族，只不过它在贵族中等级是最低的，其上依次还有大夫、卿、诸侯和周王。士的衣着器物必须严格遵守“礼”的规定，譬如士只能戴白鹿皮的帽子、死后“棺再重”、“策名委质”于更高一级的贵族等。（老士）

孔子之前，“儒”已存在。《周礼·天官》云：“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但上述“儒士”所属的“士”主要不是这种“老士”，而是在春秋时期大动荡中出现的士。（新士）

儒士与“新士”中的其他人的区别

儒士所掌握的是礼乐知识，而其他“新士”或精通历法，或精通刑名，或长于口辩。儒士就凭所掌握的礼乐知识替贵族相礼为生。

在孔子之前，儒士对礼乐知识的掌握还仅限于具体的规范（礼仪），却不知道“礼”中的道理，即只知“礼”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未有人经过反思，将其提升为理论。（小人儒）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后来的孔子身上。

孔子就是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学术化）的儒。（君子儒）

孔子的“礼”的理论包括礼的社会作用、礼的沿革、礼的文质关系和礼的本质等。“礼”的理论是儒所掌握的礼乐知识的升华，它的诞生标志着儒学的建立。

孔子就是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学术化）的儒。（君子儒）

孔子的“礼”的理论包括：礼的社会作用、礼的沿革、礼的文质关系和礼的本质等。

“礼”的理论是儒所掌握的礼乐知识的升华，它的诞生标志着儒学的建立。

接受孔子思想的儒与原来的儒有两大不同点：

（1）知识层次上的变化

接受孔子思想的儒不再以懂得礼仪规范为能事，还要进一步探究礼的底蕴。

## (2) 人生观上的变化

原来的儒以谋生为目的，而接受了孔子思想的儒不限于此，“君子谋道不谋食”，“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孔子这句话的实质就是教导弟子（子夏）不要囿于衣食的追求，要把追求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和治国安民之道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这两个变化标志着儒家学派的诞生。

何谓“儒家”？

“儒家”是中国建立最早、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学术派别。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刘向《七略》对儒家的界说比较准确地概括说明了儒家的共性：

《论六家要旨》有：“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七略》有：“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儒家的共性，概括起来有：

(一) 以孔子为共同的思想宗师。

(二) 有共同学习和遵循的经典，早期儒家的经典为“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后来《论语》和《孟子》亦被列为经典。

(三) 提倡礼教，强调人伦。

(四) 以仁义等为主要道德规范(这一项与前者在汉代被概括为“三纲五常”，维护“三纲五常”是儒[有重要思想特点之一。])

(五) 憧憬圣人为帝王的三代，主张仁政，提倡圣王之治。

(六) 助君主明教化，提倡经世济民，反对隐遁。

### 1. 术士。

周、秦、两汉用以称某些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

《周礼·天官·太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艺以教民者。”俞樾《群经平议·周官一》：“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颜师古注：“凡有道術皆爲儒。”参见章炳麟《原儒》。

### 2. 孔子创立的学派，即儒家。

《墨子·公孟》：“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孟子·尽心下》：“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韩非子·显学》：“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

又称“孔教”。中国历史上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视同宗教，与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

《晋书·宣帝纪》：“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

《梁书·儒林传序》：“魏、晋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

唐·王维《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王禮尊儒教，天兵小戰功。”

鲁迅《坟·寡妇主义》：“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

### 3. 指儒家经学。

《汉书·匡张孔马传赞》：“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诏策》：“武帝崇儒，選言弘奧。”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

### 4. 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亦泛指读书人。

《荀子·儒效》：“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韩非子·五

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